

东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目录

烽火春秋

- 为了全国的胜利……………曹代岭 朱成震 (1)
- 东阿古城话沧桑……………曹代岭 (17)
- 血肉相连 鱼水情深……………王建华 王广锋 (41)

南征北战

- 北上回忆片断……………苏民 高振中口述
王广锋整理 (48)
- 四十年岁月 三千里行程……………马绪田 (52)
- 人生处处有青山……………曲绪宏 王广锋 (84)
- 向西南进军……………马绪田 (92)

教育纵横

- 清末民初东阿教育……………曹 莽 (106)
- 西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王 玉 (113)

民族侨宗

东阿回民……………鲁 莽 (125)

祖国，我回来了……………马文义口述
曲绪宏整理 (135)

从道士到战士……………良 琪 (148)

风物丛谈

东阿老城济盛斋酱园……………王 玉 王广锋 (164)

东阿现代杂技名人传略……………夏玉水 (168)

人物千秋

刘冠英传略……………刘永禹 (175)

忆李健民同志……………王建华 (185)

知识走廊

我国八个民主党派……………文史科 (191)

为了全国的胜利

曹代岭 朱成震

经过8年抗日战争的洗礼，东阿党和人民变得更加成熟，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和革命骨干。

进入解放战争以后，作为冀鲁豫解放区一部份的东阿县，已成为战争的大后方。为了支援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东阿党和人民在大力发展生产、发动群众参军支前、做好战勤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47年7月至1949年3月，先后4次抽调近200余名干部南下北上，支援和开辟新区，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力量。

根据史光、段村建、朱明、张剑达等人的回忆及有关史料，现将东阿干部南下北上的情况，分述如下，并望知情者斧正。

(一)

1947年7月，解放战争已进行了整整一年。中

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110多万国民党军队，迫使敌人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为了实施战略反攻，奉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6月30日强渡黄河，激战鲁西南，然后，转入外线，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了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使南下大军站稳脚跟，党中央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南下干部支队，随大军行动，配合部队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政权。

6月中旬，冀鲁豫区党委将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南下干部支队的指示发至各地委。冀鲁豫六地委要求东阿县抽调11名干部参加南下。20日，县委决定：李光明（县委副书记）、段村建（四区区委书记）、史光（四区区长）、刘福瑞（一区区委书记）、尹黎卿（四区委组织委员）、雷玉俭（二区委宣传委员）、徐伯昂（四区民政助理）、

徐逢珍（四区小区工作组组长）、郭超、杜跃华、刘伯豪11位县区干部南下。其中，李光明、段村建、刘福瑞、尹黎卿4人南下豫北封邱县，史光等7人随刘邓大军南下。

29日，县委在铜城东关四区公所召开了欢送会。第二天，李光明、段村建、尹黎卿、刘福瑞、秦崇智（通讯员）一行5人踏上了南下封邱的征途。10天后，到达目的地。李光明任县委副书记、段村建任县委宣传部长兼三区区委书记，刘福瑞为一区区委书记、尹黎卿任三区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开展诉苦反霸斗争，清剿顽匪，发展和巩固解放区。

李光明等人离开东阿两天后，史光等人也离开东阿到冀鲁豫区党委驻地报到，和六地委南下干部共同编为南下大队第六中队，渡河后，随刘邓大军胜利地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打开了挺进大

别山的通道。8月8日，甩开围追之敌，随二野第二、六纵，沿沈丘、项城、息县疾驰而下，先后跨过陇海路，黄泛区，渡过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天然屏障，日夜兼程，经20多天急行军，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9月中旬，到达豫东南光山县，史光任光山与畈区区委书记、雷玉俭任区长，徐逢珍、徐伯昂为区委委员，郭超任南河店区委副书记、杜跃华任文殊区副区长。在部队的配合下，他们立即投入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

(二)

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很快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地方干部的需求量亦大为增加。为了给大别山增援干部，中央决定从冀鲁豫解放区再次抽调干部南下大别山。东阿县广大干部在大反攻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下，积极报名南下，大批在土改、复查中涌现

出的农村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也纷纷报名，最后，县委决定县委副书记王元、组织部长高平等40多名县区干部及农村积极分子南下。

1947年10月25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东阿县委驻地古驿—铜城，已是万头攒动。晨曦中，“庆祝南下干部顺利到达长江”、“南下干部是民族勇士、人民支柱”两幅巨型标语横挂大街两头。喇叭声之中，“欢送南下干部顺利到达长江北”的口号，此起彼伏。40多名南下干部在县委副书记王元、组织部长高平率领下，面露欢欣的笑容，频频挥手，向欢送的人群告别。县委书记秦延彬、新任组织部长葛道峰带领党政机关干部，站在人群前面，和南下干部握手送别。

王元等南下干部南下途中，因战争情况发生变化，继续南下有困难，遂又返回地委，待机南下。1948年1月，他们参加了地委组织的坡里整党。2月下旬，接上级指示，提前结束整党，再次起程南下。经月余的行军，3月到达安徽省淮北的阜阳

地区。

(三)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明朗化，包括山东、陕甘宁在内的各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攻势正炽，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灭亡，已见端倪。从上年初至是年春，仅几个月时间，连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宝鸡、潍县、临汾等蒋军重点设防的城市。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各解放区军民士气空前高昂，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如大江东去，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解放的地区和城市，迅速增加。

7月，为了满足新区，特别是城市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老区抽调一批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并随时派往新区。因此，东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剑达和雷玉良、高振忠、孟瑞卿、陈立忠、贾士禹、陶长恩、王继香、尹汉章、溪文

华（女）、宋宪忠等人奉调北上。他们和六地委150名干部，在地委副书记马盛斋、武装部长郭乐天的带领下，首先到达区党委驻地（清平、南乐一带）。不久，由区党委出发，历时月余，于8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城西郑庄一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即入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他们较系统的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12月，北平、天津解放在即，奉命结束学习，开赴平津地区，待机接收平津。平津战役结束后，张剑达等人参加了北平的接收，陶长恩、宋宪忠、溪文华3人参加了天津的接管。

（四）

1948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了优势。解放战争的形势飞速发展，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

1948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重申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计划。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组织5万多名干部随军南下，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将要解放的南方广大新区。冀鲁豫六地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决定东阿县组织接管一个县的干部班子，与河西县共同编为南下支队第六大队所属的第四中队。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中队长，以区为单位组成班，区委书记、区长分任正副班长。东阿县认真贯彻了地委的指示，很快抽调了68名县区干部，由付秀峰（即葛道峰）、王子奎带队到地委所在地聊城接受南下训练。1星期后，第六大队由地委书记、大队政委谢鑫鹤带领到达菏泽集结，区党委在菏泽召开了南下区以上干部大会，会后，在菏

泽晁大庄进行了20多天的紧张训练，学习新区政策，对南下干部重新进行考查。

4月4日，冀鲁豫南下支队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浩浩荡荡从菏泽出发了。南下干部身着崭新军装，胸前佩带着白底黑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肩挎米带、子弹带，显得分外威武。

21日凌晨，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23日早晨，南下支队冒雨在安庆渡过长江后，向赣东北继续进发。5月初第六大队到赣东北地区，接管了贵溪地区。

7日，第五中队在付秀峰、王子奎、赵庆德率领下，由鹰潭军分区1连武装的护送下由鹰潭出发，前去接管资溪县。8日晚6时，到达资溪县城，国民党资溪县长徐日太拒绝投降，经1小时战斗，占领了县城，残敌逃往城南山区。当晚，中共资溪工作委员会成立，付秀峰任书记、王子奎、赵庆德为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以王子奎为县长的资溪县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资溪县。

资溪，位于赣东，武夷山脉的西麓，东邻尚未解放的福建，地势东高西低，境内群山耸峙，山高路险，树茂林深，风景俊毓，有山皆青，是水俱秀，风光旖旎，浑然天成，山川钟灵，内涵殷富。土地革命时期，资溪曾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肖劲光等都在资溪留下了足迹。早在1926年，这里就曾组织过工会、农会、学生会。1927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33年2月成立了中共资溪中心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资溪失陷了。自此，血风腥雨，骤然而降，资溪人民的灾难开始了，这时期，全县牺牲和被杀害的烈士，计有880余人（不包括那些无名可查和全家杀尽无人向政府报告的）。

白色恐怖没有吓倒资溪人民，他们从没停止过对敌人的斗争，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终于迎来资溪的解放。

资溪工委和县政府成立后，立即向各区分派干部、组建区委和区政府。接管人员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水土不服等困难，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深入山乡村寨，发动群众，收缴枪支，借征粮食，筹组县区武装，争取教育旧职员。同时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举办知识分子和青年训练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胜利。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不到半月的时间初步打开了局面。仅二区就借征粮食2万斤，收枪20多支，子弹100余发。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江南时，国民党残部，地方反动势力、散兵游勇、土匪流氓，慑于大军威势，未敢轻举妄动，除少数旧职员同人民政府会面，作点工作外，大部逃进山区村寨，有的表面上交了枪而实际上没有投降，仍暗中与人民为敌，伺机反扑，妄图东山再起。国民党资溪县保警大队副大队长曾皋九，受伪县长徐日太之命率残部逃进深山，他勾结国民

党军官廖运昌、王象起和光泽县匪首蔡碱三、金溪匪首向理安等，拼凑成千余人的“闽浙赣反共救国靖卫总队”，流窜于资溪和邻县边山乡，散布政治谣言，蛊惑人心，拉拢反动势力，组织“反共地下军”，勒逼村民交款交粮，传送情报，绑架杀害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茂林乡乡长雷年丰、横山乡乡长于洪雁夫妇、石峡村长元荣发、贫协组长饶样阶、珀玕村长魏水生、贫协主任王天苟等20余名乡村干部和数十名村民先后残遭杀害。

初创时期的资溪县人民政权，百业待举，人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革命武装还未筹备就绪，全县只有30余人的正规武装，加上南下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总计不过百余人枪，处境十分困难。

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完成筹粮任务，县工委组织大部分干部分头下到各区乡村寨，组织发动群众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21日晚，以曾皋九、李泉学为首的数百名反动武装分子，在李子寨村秘密集结，密谋围攻高阜区政府。22日拂晓，曾皋九率众包围了高阜三区政府。三区区长王月亭和武装委员李发兴、民运委员田万芝、社会委员胥继尧及李玉斌、王培森、刘玉英（女）等人带领区队几名战士奋勇抵抗，接连打退敌人的几次攻击。敌人恼羞成怒，丧心病狂地用稻草和汽油点着了区政府的大门和房屋。战斗中李玉斌战死，王月亭等人子弹用尽，不幸被俘，除刘玉英外，均被敌活埋，残遭杀害。

王月亭等人殉难不久，一区副区长王庆良、组织干事闵明月、民运委员毕养之、通讯员冯云平也先后遭敌杀害。他们为全国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面对政治土匪的猖獗，县工委调整了部署，在建政、征粮的同时，抓紧了群众的发动组织和县区武装的整顿和建设，加强了对国民党残余武

装的斗争，逐步稳定了形势。

1949年7月18日，第二野战军前委遵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发出关于做好向大西南进军的指示。据此，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动员向大西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地委组织了西进干部支队第四大队，东阿干部仍为第四中队。8月30日，四中队向第四野战军接管人员作了移交后，在资溪县人民的夹道欢送下，告别了长眠于地下的战友，离开了共同战斗了115天的资溪人民。

9月11日，西进支队集中在赣东北区党委驻地上饶进行整训，10多天后开始西进。11月8日，西进第四大队到达贵州镇远。11月，组成镇远地委、行署、军分区。各中队分赴镇远行署所属12县实行接管。第四中队大部（一部分抽调外县）由付秀峰、王子奎带领到达台江县，成立了中共台江县委、人民政府，付秀峰、王子奎分任书记、县长。

台江，位于贵州省的东南部，和江西资溪县相比，自然条件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差甚远，这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山高水恶，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全县人口不足1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50%以上，大都散居在崇山峻岭之间。

东阿南下干部到达台江后，征尘未洗，疲劳未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工作。他们根据党的新区政策，从上到下全面接管的同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约法三章”，对伪职人员进行登记，教育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收缴武器弹药，建立人民武装，训练保甲人员，恢复交通与金融贸易，加强民族工作，借征粮食，支援前线，各项工作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由于他们发扬了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牢记党的依靠群众的宗旨，很快取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站稳了脚跟。不到半月的时间，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档案，取得了

到台江后的第一个胜利。

12月下旬，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开始与封建地方势力、土匪等反动武装相勾结，趁主力入川作战之际，妄图发动反革命暴乱，杀害基层干部、拦路抢劫、破坏交通、造谣惑众，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恶毒地提出了“杀北方老干部”的反革命口号。在“黑云压城”、“风满楼”之际，新建不久的台江县委、人民政府在地委的领导、军队的支持下，发动群众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控诉他们的新旧罪行，粉碎了敌人企图裹胁群众参加暴乱的阴谋。随后，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镇反运动。至1951年底，终于取得了剿匪的最后胜利，大批国民党残余分子和惯匪流氓落入法网。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其后，他们同台江人民共同担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东阿南下干部为中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东阿古城话沧桑

曹代岭

(一)

东阿县位处黄河下游，黄河自西南而东北贯穿县境，小清河由南流入，“分疆画野，群山耸峙于东南；辘粟转漕，二水交流于西北。星映宿危之虚，界连鲁卫之交”。东南环山地势高，西北蕴水低而洼；东扼泰岱西麓，西接鲁西平原东陲。

秦始行郡县，东阿之名初定，上下凡二千余年，辖区虽有变化，但东阿名相沿至今。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3年）县城治新桥镇（今东阿旧城村），明洪武8年（1375年）为避水患，知县宋真徙县城于谷城镇（今平阴东阿镇），此后，历经明、清两朝至民国、日伪时期，该镇一直为东阿县政府驻地。1946年10月，东阿县人民政府为

避蒋军锋芒，迁至黄河西岸，该镇划归平阴县。东阿镇作为县府治地，自明洪武8年起，几近六百年。

东阿镇，座落在黄河东岸，泰岱之西的崇山之中。出城往东，是重嶂叠谷、蜿蜒数百里、龙腾蛇舞的鲁中山区；西渡黄河，则为水肥草绿、物实民丰、一马平川的鲁西平原。龙盘虎踞，百里沃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史书记载：“大破秦军东阿”、“项梁与齐救东阿”（《项羽本纪》）；“彭越渡河击楚东阿”（《高祖本纪》）。城之四周，溪水纵横，山泉四溢，溅珠弄影，流银浮翠；洪范、白雁，泉水翻动，声如金石，汇流而成狼溪河。河水穿城而过，将城一分为二，东西两城间，有永济桥连通。桥上清石铺面，两旁雕石成行；石兽造形，巧夺天工，或仰天向望，或低头长思，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东西两城占地约二平方公里，承天地之精华，贾造物之青睐，物华天宝，地灵人杰。

(二)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0月，日军占我华北，继而向我山东境内推进。年底，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未战先逃，山东大部落入敌手。翌年初，蒋介石以失地罪名将韩处决。不久，蒋令其心腹，原青岛市长沈鸿烈出任山东省主席。

1938年6月初，沈鸿烈率其“山东省政府”全套人马、省保安队独立28旅，来到东阿，将地处平阿山区的东阿城作为他的省府驻地。

纯朴的东阿人民对于沈鸿烈一行的到来，给予了热情地欢迎。他们希望新的省主席能有所作为，带领山东人民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但沈鸿烈却置人民的殷切希望于不顾，不但不思御敌之策，反而催粮催款、索东要西、号房征地、设置机关、安置要员、肆意铺张，苟安于东阿一隅。

不久，济南日军获悉沈鸿烈到了东阿，遂派

兵500余人，由济南奔袭东阿。6月29日（旧历6月初2）下午，日军沿黄河东岸直趋东阿城。

亭山头设防的独立28旅（又称手枪旅）在省保安司令参谋长廖安邦的带领下，未与敌接火，即急忙跑回城里。沈鸿烈得到报告后，方寸大乱，只好下令逃跑。刚刚逃出南门，日军已到达北门。威风凛凛的省主席、装备齐全的手枪旅，未放一枪，就把喧闹一时的省府驻地——东阿城拱手送给了日军，沈成了韩复榘第二。

沈鸿烈率省府所属官员败逃黄河岸上，走投无路，派人向范筑先求救。范立即亲自率其第二支队李相臣团和五、六支队赶来，把沈接到黄河西，并对东阿日军展开围攻。

范令第五支队从西、南两面、第六支队从北、东两面、二支队李团作预备队，大包围式把城团团围住。前沿派出小部队利用地形接近县城。敌人出击，就节节后退；敌回撤，就节节追击。夜间则以小部队逼近城墙，袭击骚扰敌人，使其昼

夜不得安宁。第六支队特务营排长穆大侠率小分队前进至墙下，以手榴弹向敌轰击。敌人在城墙上每到晚上，便点上无数灯笼火把，以此壮胆。两天后，山东省第一专署专员郁仁智率部也赶到东阿城下，参加围城战斗，围城部队士气更加高涨。经4天围困，日军疲惫不堪，眼见我围城之势不减，遂弃城窜回济南。

日军败回济南后，不甘心失败，积极筹划再次占领东阿，并指示汉奸张勉之（观城人）、乔迨之等拼组伪政权，阴谋长期占领东阿。不久，日军103师数千人，从济南出发取道东阿、巨野，向陇海路商邱一带钳击徐州，中旬到达东阿。该师团吉井部千余人进占东阿，东阿城第二次沦陷。10余天后，吉井部队大部南调，平井率百余日军长驻东阿，并开始在校内外修筑炮楼、安设据点。先后在城东小泰山、城西西山岭、西城老当铺等处安上了据点。

1940年夏，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日军

又增调100余人到东阿，同时在广大农村开挖封锁沟、设据点。至1942年，全县共挖封锁沟3条、设据点47个，日军兵力达300多人。

日军重新占领东阿时，张勉之、乔迪之等汉奸带18名随员，也随其主子到达东阿组织汉奸政权。张勉之任伪县长、乔迪之任秘书、张吉春任伪警备大队长。次年春，伪区乡政权拼凑完毕，同时开始组建伪警备队。至1940年底，伪警备队发展到两个大队、10个中队。后又发展到3个大队，15个中队，近2千余人。除此之外还有宪兵队（日军）、平井工作队（日人任队长）、手枪队以及维持会、新民会等汉奸特务组织。这些民族败类，揖盗入门，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欺压同胞，惨杀我抗日人员，甘当侵略者鹰犬，干尽了坏事。

日本侵略者自1938年6月29日占东阿起，至1945年投降止，7年时间里，多次对我抗日军民进行灭绝人性的“扫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

对我实行政、经、特相结合的“总力战”和“三光政策”为内容的掠夺战。“铁壁合围”，长期清剿、封锁，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占我土地、屠我乡村、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三光政策下，芦舍成墟，鸟兽形稀，置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7年时间里，日军焚毁抢掠我粮食19839万斤，焚烧毁坏房屋41135间，抢、杀大牲畜5890余头，被其残杀和流亡失踪、被抓壮丁长期未归者，近万人。

(三)

有压迫就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受到了东阿人民的激烈反抗。全县人民在中共东阿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东阿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对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

中共东阿党组织建立于1933年的秋天。至1935年底，不到两年时间，东阿党组织有了长足发展，已有100多名党员和20多个支部（小组），

党员遍布全县各地，是当时全省有党员较多的县份之一。

1936年春，中共东阿县委建立，东阿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从此，东阿党的发展和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东阿党组织建立的时候，正值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一、二八事变”（1932年）接连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灭我中华的阴谋，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东阿党组织自建立伊始，就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唤起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作重要任务。“七、七事变”后，华北迅速沦陷，日军逼近山东，全省上下为之震动。广大民众和一切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抗战。鉴于此，县委把领导群众抗日，作为其中心工作。9月，中共山东省委制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条纲领，要求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县委坚决贯彻了省委的指示，下大力气

抓武装。11月，成立了东阿县抗日救国会，以救国会的形式，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共同抗日的口号下，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做开明士绅、民团、会首等实力派的教育争取工作，动员他们与我党合作抗日，先后争取了白凤义、孟吉魁、苏虎臣等实力人物参加抗日。与此同时，县委选派得力人员打入民团、红枪会内部宣传抗日、争取群众、掌握领导权，后来这些武装大部被改编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8年5月，县委开展“红五月突击月活动”，突击发展党员，全县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人数骤增，农村支部普遍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得到巩固和发展。

7月中旬，日军汽车运输队数十辆汽车在200余士兵的护卫下，经黄河故道向位山方向行进，途经苦山附近时，汽车陷在黄河滩内。范筑先闻讯率其五、六、二十九支队前去截击敌人。是时，万余民团、红枪会员在我党抗日政策的感召下，

涌上黄河大堤，配合范筑先部向敌进攻。他们用土炮、土枪向日军射击。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俘敌1人，烧毁汽车数十辆，缴获满载物资的汽车13辆。

月底，日军第二次占领东阿城，11月15日攻占聊城、范筑先战死。形势恶化，人心浮动。县委发动党员积极工作，稳定人心，很快使局势得到控制。

1939年2月，东阿县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成立，不久，各区乡基层动委会也随即建立。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各级动委会的领导。8月，中共东阿各区委员会、抗日政府相继建立。这期间，县委开始组织我党自己的武装，2月建立黄河支队；5月会同阳谷、聊城县委组建了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第四游击大队；6月，改造“万国和平道德会”武装，并于9月，组建了运东武装工作团。此外各区亦相继建立了三十至四十人枪的区武装（区队）。这些武装建立后，大

都立即投入了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东阿抗日的中坚。至此，东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东阿抗日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上级党的关怀与支持 and 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帮助。19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奉刘、邓之命来东阿一带活动。9月，肖华根据总部指示，率东进挺进纵队机关和曾国华支队进驻东阿四区小街子，开辟肥（城）、（平）阴、（东）阿地区。其后，115师3旅、山纵六支队等主力部队也多次来东阿，对东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元旦，东阿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不久又建立了拥有400余人枪的县大队。春，县委设立扩军委员会，大力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斑广、陈广、黄河、青年、农民等地方游击队迅速建立，全县军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伪的恐慌和重视，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4月底，

东纵五支队、129师骑兵团等主力先后调离东阿，开赴鲁西参加反顽战役。日军乘机进占了我河西地区。7月在陈店子、广粮门等地相继安设了据点。一时炮楼林立，封锁沟交错，日伪猖獗，敌特横行。我抗日政府被迫转入地下，东阿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难阶段。

东阿党组织领导抗日军民与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坚持抗战，打击日伪嚣张气焰，适时地进行了斗争方式、策略的调整。1、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2、实行精兵减政、充实基层、加强第一线领导力量。3、县委增设敌工部，加强对敌伪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派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发展建立秘密关系。4、打击坏中坏、对死心踏地的投敌叛变分子和铁杆汉奸进行镇压。先后处决了孟广福、郎笑山、周庆印、肖冠英、王毓恭等首恶分子，使铁杆汉奸有所收敛，一般敌伪人员不敢继续作恶。5、部队化整为零，实行小部队活动、分散打

击敌人；积极发展地下民兵武装，组织兵民联防。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终于渡过了艰难时期，迎来了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

1943年秋，东阿抗日形势根本好转，形成了有敌人无敌区的局面（大部伪军据点与我建立了秘密关系，不敢与我为敌，我抗日人员可以自由行动），并开始拔除伪据点。至次年7月，河西地区40多个据点均被我拔除，迫使苦山、鱼山、凌山等据点伪军起义或投诚，黄河以西地区全部收复。

阴霾散尽，蓝天重现。严冬过去，春暖花开。东阿县委在巩固发展河西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整军练武、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准备收复包括县城在内的河东地区。

（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再失利，侵华日军相继南调，由伪军接防，冀鲁豫边

区周围的日军兵力明显减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空前有利的形势下，冀鲁豫边区军民连续发起主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至1944年底，解放区较上年扩大了1倍以上，达20万平方公里；解放同胞500余万；新收复县城7座，连同过去的3座，共有10个完整县。已由零碎、小块根据地，扩大为连成一片的大块解放区。敌人被迫由面的占领变为点线占领。驻东阿日军已由300多人减少为不足50人，伪军不到千人，集中在县城等几个据点内。

1945年5月，冀鲁豫军区经豫北、南乐战役之后，军威大振，敌伪惶惶不安。各部队乘胜展开攻势，在解放区西部、北部连续收复了南宮、新河、任县、大名……等县城。敌伪军狼狈逃窜，纷纷被歼。二、四、五、六分区连成一片，在纵横数百里方园内，已无敌踪。我军局部反攻之强大威力，方兴未艾。

为武装保卫麦收，扩大解放区。冀鲁豫军区

于5月9日下达了作字第4号命令。令一、八、十一3个分区主力和九分区骑兵团及一部分地方武装，组织东平战役，攻克东阿、东平等战略要地。并消灭长期盘踞于巨（野）、嘉（祥）、汶（上）一带的顽军孙秉贤主力，扫清边区东部之敌伪及顽军。

军区决定：由一、八、十一分区的部队组成3个纵队，分别担任攻占东阿、东平和消灭孙秉贤主力的任务。八分区5、7团和6团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中央纵队，负责攻克东平；十一分区部队为右路纵队，负责消灭孙秉贤顽军；一分区1、2、3团及东阿、平阿、聊城等县武装组成左路纵队，由一分区司令员刘致远、政委邓存伦指挥，负责攻占东阿，并以一部分兵力打击平阴、泰安来援之敌。战役发起时间为5月17日20时，要求战役必须于拂晓前解决战斗。整个战役由杨勇副司令员、曹里怀参谋长带电台随中央纵队进至东平附近统一指挥。

当时，我一分区部队正在东平境内攻打刘旺山据点。战斗一结束，刘致远司令员、邓存伦政委即在东阿四区教场铺村召开了分区团以上干部和东阿、聊城、阳谷等县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军区组织东平战役的命令，对攻占东阿城进行细致研究和深入地战斗动员，布置战役中的民兵支前和物资保障工作。会议决定，分区3个团、东阿、平阿、聊城市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参加战斗。要求东阿县委、张秋县委敌工部长韩雁北、周子臣带领有关人员前往东阿，与城中内线人员取得联系，了解敌人兵力配置、城防工事，并要其届时打开城门，策应部队攻城；令分区作战股长丛芝法组织人员侦察城外地形。

最后，刘司令下达了口述命令：分区二、三团为攻城部队，具体任务：三团负责攻东城，二团负责攻西城；一团、东阿、平阿、聊城市大队阻击来援之敌。具体配置：一团在城北亭山头一线阻击平阴之敌；平阿县大队在城东大寨山一带

警戒东面之敌；东阿、聊城市大队分别在城西、南面对阳谷、聊城来援之敌进行阻击。战斗定于17日24时开始，同时攻城。会后，各参战部队分别准备。

东阿县委敌工部长韩雁北、干事史光会同张秋县委敌工部长周子臣，一行3人，来到东阿城。在内线人员的配合下，经一天努力，摸清了敌人兵力布署、火力配置情况、同内线人员约定了行动时间、步骤和信号。

分区作战股长丛芝法、敌工站长梁仁魁头戴礼帽，身穿大褂，扮成汉奸模样，从城北小苗头往东，边走边观察周围地形地貌，一直来到城东小泰山下。天黑后，他们摸进东关，来到东门，详细察看了城门守军情况，绘制了地形图。

17日，参战部队齐集教场铺村，刘司令员亲自召开了动员大会。会上，群情振奋，士气昂扬，大家为战略反攻的到来欢呼。全军上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打好这一仗。会后，各部队

分头出发。

太阳的余辉尚未散尽，性急的星星已稀疏的挂在空中，惊奇地眨着眼睛，注视着突然出现在黄河岸边的一队队武装齐整的士兵，秩序井然地涉过黄河，化作几支利箭，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向东阿城疾射而去。

二团由姜沟渡河后，在团长付从藻带领下，卸枚疾进，直奔城北；布克政委率三团利用夜色，迂回到城南，绕过南关，顺八里沟直插城东。一营、二营分别进至东门、东南门外。司令部设在北门外不远的小村内。

晚11时许，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

东阿城敌守军，除日军1个小队（40余人）外，还有县警备司令刘德超的8个中队及伪县政府的武装人员，共1000余人。其配置为：刘德超司令部及其3、5、7、9、10五个中队和县政府驻东城；日军和尹德月中队（11中队）守西城。另外城东小泰山、城西西山岭分驻周方斋中队、房

辉华中队，各100余人。西城筑有炮楼5座（城西北角1座，日军司令部4座）。东、西两城，互为犄角之势，既可独立为战，又能互相支援。墙高壕深，易守难攻。

11时刚过，各攻击分队迅速向城下运动。二团一部刚刚到达北门外，恰与乘夜外出抢粮的敌人遭遇。枪声一响，惊动了城内敌人，敌人齐集墙上，向我攻城部队猛烈射击。遭此变故，内线人员已无法按原计划打开城门。

刘司令下令强攻。各攻城分队立即向守城之敌发起攻击。城四周顿时火光闪闪，气浪翻滚。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我军战士的呐喊声，响成一片。

守城之敌困兽犹斗，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住我军进攻道路。

担任东南门主攻任务的2营5连，打得最为艰苦，因墙高沟深，不易接近，梯子很难竖起来，大部掉进护城河内。几次攻击都未奏效。掩护攻

城的机抢射手，大部牺牲。营首长立即让4连接替5连，继续强攻东南门。焦急待命的4连，在连长曹洪文的率领下，迅速插上，换下了5连。

担任东门主攻任务的是三团一营三连，他们攻击受挫后，在分区作战股长丛芝法的亲自指挥下，迅速调整战术，组织爆破组，实施强行爆破。突击排长在全连火力掩护下，将一包包炸药送至城门下……。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过后，滚滚硝烟，冲天而起，城门洞开。3连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门，攻占了城楼及两侧城墙，掩护主力进城……。伪县政府、伪司令部很快被我攻占。敌在我打击下，纷纷向西城逃去。

在东南门久攻不下的4连指战员，见东门已破，在连长率领下，转道东门进城。进城后，他们直扑永济桥头，扼住通向西城的咽喉，将正在向西城溃逃的敌人堵在东城内。经1个多小时激战，东城完全被我占领。

攻击西城的二团，在内线人员的配合下，利用云梯，也很快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攻进城内。

拂晓前，城内伪军已被肃清，只剩西城东北角日军炮楼在我重兵围困下，未被攻克。我军几次攻击，都因敌火力过猛，地形开阔，无处隐身，未能奏效，遂与日军形成僵持局面。

攻打城外小泰山、西山岭制高点的战斗还未结束。为了减少部队伤亡，尽快占领两处制高点，免使我攻击日军炮楼的部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刘司令派人找来韩雁北等人，命令他们通过敌工关系，动员两处敌人放下武器。同时令攻击部队做好准备，一旦劝降失败，立即发起攻击，力争天亮前解决两处的敌人，占领两处敌人阵地。

韩雁北等人首先来到西山岭下。和围困部队打过招呼后，上山直接找到房辉华，经说明利害关系后，房辉华同意放下武器，率队下了山。随

后他们又来到东城，找到小泰山敌中队长周方斋的儿子，让他上山动员周方斋投降。天亮后，周方斋捎信要求与我谈判投降条件，韩雁北随同来人上山，经谈判，周方斋同意投降。小泰山被我控制。

上午，刘司令鉴于日军据点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难以靠近，我军缺乏重武器。改变强攻战术，采取坑道作业，强行爆破，炸毁日军炮楼。经一天多土工作业，一条长几十米的坑道，从西北方通向西北炮楼下。19日晨，一声巨响，敌炮楼被炸塌一角。我军乘机出击，但又遭日军中心炮楼的火力封锁，部队未能攻进据点。后又几次组织攻击，未果。遂决定再挖坑道，因遇山根，无法作业，只得停止作业。

上午10时，在亭山头担责警戒任务的一团来报，平阴方向大批日伪军向东阿方向运动。不久，大寨山方向的平阿县大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日军宾野部队已越过县大队的警戒线，向东阿扑来。

刘司令员得到情报后，决定部队撤出战斗。

中午时分，部队押着俘虏，撤离东阿城。

是役，我共消灭日军20余人，毙伤、俘虏700多人，伪县长乔迪之及大批日伪官员，被我生俘。

这次攻城战斗，东阿县委除派出县大队和敌工人员直接参加战斗外，还抽调了大批民工支援作战，参加破城（拆城墙），为战斗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3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驻东阿日军深感罪恶深重，害怕被东阿人民消灭，于8月14日，乘夜暗，携刘德超等500余人，惶惶逃往济南。

15日，东阿县委、抗日民主政府进驻古城东阿。

狼溪河又恢复了往日的笑颜，涛涛流水，荡漾着碧波，唱着欢乐的歌，穿过古城，向远方流去……。历经沧桑的古城，第一次真正属于人民所有，开始了它的新生。

中共东阿党组织，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抗战的旗帜，团结东阿人民，经过8年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战胜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她也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成熟起来，成为东阿人民的坚强核心。

1945年5月30日《鲁西北日报》关于我军攻克东平、东阿的消息：

我军攻克东平、东阿西城

我冀鲁豫边区部队继续扩展攻势，于17日集结主力一部，分头进攻东阿、东平两座县城，当即突入城内。于19日晚，我军将东平城内敌伪全数歼灭，并将该城之外围据点孟楼、三官庙、大鞍山一扫净光，东平城周围之大片土地已获解放。同日晚，东阿城内之伪军亦被我军全部解决，将敌人压迫于一小炮楼中，正进行歼灭。现我主力一部与我分区武装正集中力量向阳谷以北扩大

战绩中。是役生俘日军3名，俘伪军1500余人，缴获轻机枪30挺，步枪1500枝，粮食2万余斤。

注：此文系根据当事人韩雁北、丛芝法、曹洪文、耿宗周回忆材料整理综合而成。

血肉相连 鱼水情深

——记抗日战争时期张醒民同志在东阿

王建华 王广锋

抗日战争中期，在敌人碉堡林立、疯狂扫荡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张醒民同志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在东阿这块土地上，日夜奔波，踏遍了东阿各个村庄，团结了人民，有力地打击了敌伪顽分子。人民群众关心他，爱护他，从而保证了他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张醒民同志是我县湖西渡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40年下半年在冀鲁豫边区公安局受训后回到东阿，直到

45年抗日战争胜利，始终从事公安工作和武装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醒民同志与王海的知名人士王凤周先生过往甚密，常吃住在他家。王老先生待他亲如家人。王凤周先生思想进步，方园几十里众人皆知，人人尊重，很有威望。他掩护过我们地县区不少革命领导干部和家属，为抗日救国大业作出过很大贡献。通过王凤周先生，醒民同志结识了王玉荣、王玉栋、王继广、王继典、王建华等，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们结成了生死之交。在王玉栋的帮助下，醒民同志与他的内弟，杨庄的杨学明交上了朋友，他在杨庄开展工作时，杨学明不但提供情报，同时还供食宿，保证他的安全。

为了更加有利于开展对敌斗争，经组织批准，醒民同志与侯庄的侯云平，贺庄的贺继泗，郑于的姚瑞祥、姚元利等结为金兰之好，他们在醒民同志的影响下，逐渐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为

革命做出过一定贡献。

县公安局成立时，环境艰苦，人少事多，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情报、锄奸防特、维护地方治安，团结人民，打击日寇。从西南阳谷，张秋，阿城，堤口，邢庄，官庄，郭万庄，大杨庄，到铜城，郑于，侯庄，贺庄，周庄，杨柳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公安情报网。张醒民等同志更是如鱼得水，在群众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任务；在群众的掩护下，一次次化险为夷。

一九四二年，日伪军在铜城安据点后，对我抗日军民进行了一次疯狂扫荡。公安局长李健民和醒民同志与县大队、警卫连等人，被围困在郑于以北，另一部分日伪从小王庄以南与铜城炮楼的敌人夹击我干部战士。这时郑于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信；他们吃不上饭，群众就把省下来的窝窝头送去给他们吃。群众真是了不起。

一九四三年春季，醒民同志患了眼病，组织上安排他在周庄周传浩大伯家养病。周大伯是我

党地下情报员，抗日战争期间，掩护过很多革命同志，为东阿的解放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来曾被敌人抓去，鞭笞，毒打，过电等酷刑，以至胳膊成了残疾，都没能使他老人家屈服，最终被我地下工作人员将他营救出来。在醒民同志养病的日子里，老人家对他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有一天拂晓，日伪军三百多人正在扫荡，他们肆无忌惮地进入了大周庄，牵牛、抓鸡、抢东西。醒民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穿好衣服。大伯帮他化妆，以备不测。他提枪出门，选好地方，隐蔽起来，观察动静。他看到敌人悠然自得，无所防备，当即打了一排枪，紧接着，他又跑到另外几个地方接连开枪，骤然枪声四起，敌人不备，晕头转向，不知来了多少八路，急忙撤退。事后，县公安局长李健民、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常在大会上表扬醒民同志机智、勇敢、单枪匹马大战大周庄。

一九四三年春季，形势恶化，日伪扫荡频繁，妄图做垂死挣扎。一天上午，醒民同志从郑于姚

瑞祥家出来，打算去县情报站，刚走至南门，遇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小女孩见到醒民同志忙说：“二叔，你往哪里去啊？前面有鬼子来了”。他一听，立即隐蔽起来，做好准备，然后悄悄从郑于北门出去，方才脱险。走不多远，他回头看见郑于尘土飞扬、鸡鸣狗叫，不禁捏了一把汗。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感慨地说：“是小姑娘救了我一命”。

醒民同志常说：“在过去那种艰苦的环境中，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为我们站岗放哨送情报，管我们吃住，真了不起，由此证明，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若没群众的支持，不用说打鬼子，就是饿，也把我们饿死了”。他每每忆起这些，就感慨万分。

醒民同志在东阿时，年纪轻轻，经过战斗的洗礼，斗争的考验，锻炼成了一名成熟的革命领导干部。他常与铜城的周林庆、王乐义、朱王山的秦广武，官庄的唐殿安，王海的王凤周先生等

有知识的开明人士打交道。他们从没把他当娃娃看待。醒民同志还特别注重做好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小秦庄的赵春林，耿集的张保房，东侯庄的王振邦，侯庄的李广灿，这几个人都曾与邦会有联系。醒民同志利用他们的影响，积极做好敌伪工作。打铜城炮楼时，赵春林给醒民同志与日伪大队付黄惠民接上的头，使铜城炮楼不攻自破。

搞敌伪工作需要有人胆略，要从气魄上压倒对手。醒民同志说：“敌伪工作不可忽视，做得好了，化害为利。开始有些人很不好，后来逐渐被我斗服了”。铜城据点敌伪特工班的赵二虎、刘恒东就是这样的人。一次，醒民同志去雷保香家，正巧刘恒东等几个伪军也在那里，开始，刘恒东等人很惊讶，但醒民同志却若无其事地跟他们聊。谈话间，醒民同志故意将他的一支手枪放在桌子上。他当时带着两支枪，放在桌子上的那支没子弹，接着他假装去小便，看他们怎么样。

当刘恒东伸手去摸桌子上的手枪时，醒民同志一步跨进屋里，刘恒东不知所措。醒民同志哈哈一笑说：“我枪里没子弹”。刘恒东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被醒民同志这一胆大心细的举动震慑住了。从此，刘恒东等人知道醒民同志做事有备无患，不好惹，不敢做坏事，后来为我抗日政府提供过不少情报。

醒民同志担任服务大队长，有侦察员那种独特的机警和灵敏。一次，他在柳林屯村附近的小辛庄徐长义（公安干部）家住下，突然敌军压境，包围了柳林屯。他急忙化妆逃跑，当他跑到曹庙西门，正巧碰到一队伪军向他走来，并向他举起了枪。醒民同志非常沉着、机智，一边做好思想准备，以防万一，一边若无其事地说：“怎么了，不认识了？自己人！”这样敌人被他弄懵了，迷迷糊糊，对他打着哈哈放行了。

抗日战争期间，醒民同志在铜城一带培养了很多青年，他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就

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东阿期间，深入群众，组织宣传群众，依靠群众，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树立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他做好工作的后盾。正因为有王凤周先生这样关心、牵挂着他的群众，他才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来，战斗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注：王建华，系东阿县原司法局局长。

张醒民，湖北省公安厅厅长，现已离休。

北上回忆片断

苏 民 高振忠口述

王广锋 整理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展顺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蒋军三百多个旅（师），东北全部解放，华北解放在即，华东和中原只剩少数敌人，蒋军的防线已被粉碎，我军由劣势转为优势。

是年七月，由于形势需要，从各解放区抽调

干部去中央党校（华北局党校）学习，旨在为全国培养干部。冀鲁豫六地委（聊城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了约150名干部由地委副书记马盛斋、地委武装部长郭乐天带队，去华北党校学习。东阿干部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剑达带领，一行十多人，去聊城地委报到。这次抽调的干部有：雷玉良、高振忠、陶长恩、孟瑞卿、陈立中、贾士禹、王继香、尹汉章、溪文华、宗宪忠等。在马盛斋同志的带领下，从冀鲁豫区党委驻地范县出发北上。一路行军，徒步前进，行程一个多月到达河北衡水，改坐货车来到石家庄。在距石家庄不远的平山县城西郑庄——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即去华北党校。华北党校，当时是中央为全国培养干部的学校，在平山县王母村，薄一波任校长、刘澜涛任副校长，李葆华任教务主任。学校设校部，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班。一个班十多个人，培养的干部，将要接管一个县。我们在华北党校学习三个多月，主要学习内容是各领导

人关于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土地政策和新区政策。领导人做报告时，都是有全校几千人参加听讲。我们这批干部本来是储存起来准备南下的，记得邓小平同志动员我们南下时曾说：南方不是太热，贴饼子熟不了，不愿吃大米，可以吃白面。

后来，随着全国各战场和平津形势的发展，党中央改变了对平津“围而不打”的政策，决定先解放平津，再渡江南下，我们这批干部的去向发生了改变。由准备接管华南，变成了接管平津。四八年十二月底，平、津解放在即，我们奉命结束学习，开赴平津地区。在良乡，我们华北党校学习的这批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去北京，一部分去天津。去北京的东阿干部有：张剑达、高振忠、雷玉良、陈立中、陶仁德、尹汉章等。其他人如孟瑞卿、陶长恩、王继香等去了天津。在良乡，彭真同志给我们讲话，欢迎我们去接管平津，并讲了进城后接管政策及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从王母坐大车、骑自行车和步行到良乡。

进京时，只有区委书记有带枪资格，并准许配一个通讯员。我们于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到达北京郊区，二月七日举行进城仪式。由于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一切建筑物保存完好，进京后，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初进城时，我们这批来自农村的干部对城市穿戴等有很多不习惯和看不惯。去天津的同志也是如此。看见女人冬天穿旗袍，嘴上抹着口红，心里就犯恶。称这是“吃孩子的嘴，摸鱼的腿”。随着工作的深入，时间一久，我们都慢慢习惯了，对一些事情也见怪不怪了。我们在上级党组织及北京市委的领导下，接管任务很快完成，使北京的社会秩序，迅速正常起来。

这次进京的东阿籍干部除从东阿县来的十几位以外，还有从其他县来的。如：苏民同志、王红同志，他们是从茌平去华北党校的。李玉铭同志是从聊阳县去的。当时，李玉铭同志任聊阳县县长。

建国后，为了支援北京工业建设，我们一批东阿籍干部去了北京，如李长清、杨森等。五三年，平原省撤消后，东阿干部又进京一批。张中雨等就是这批进京的。现在，在北京工作的东阿籍老干部有华北党校去的一批，支援工业建设去的一批，撤消平原省去的一批，除此之外，还有随部队进京，后有的又转业至北京地方工作。我们东阿籍的在京干部，都曾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现大都退居二线。但保持晚节，奉献余热的革命意志都很强烈，很乐意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哺育我们的这块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服务。

四十年岁月 三千里行程

马绪田

日月流逝，寒来暑往，转瞬间，我离开故乡，随军南下，来到这祖国的南部边陲贵州，已四十

年了。每当欢渡佳节，漫步街头，仰望明月，凝视流云，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对于生我养我的故土东阿，深深地怀念着。那奔腾的黄河之滨，曾留下我少年时的足迹；那伟岸的河防大堤林莽间，曾留下和伙伴割草放牧时的欢声笑语。“拳不打铜城”的传说；故乡的特产阿胶、大枣；东阿王的故事；杂技之乡的佳话，至今记忆犹新，时刻牵着我插上回忆的翅膀，越过三千里河山，梦中去遨游留连。故乡的父老乡亲啊，我们南下的东阿儿女怀念您！

故乡的人民，也一定在挂念着我们。那些南下的干部，到底怎样了？他们是否经得住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考验？他们怎样冒着枪林弹雨，长途跋涉，进军江南？如今，岁月已使我们染上了白发，我以一个故乡的南下老兵身份，向东阿人民作一个汇报。尽管我和我的战友，能力有高低，成就有大小，但我们没给故乡丢脸，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每个人的历史之页。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让我以对故乡特有的感情，写下南下记事。

一、组织南下

一九四八年底，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民解放军，正在乘胜前进，夺取全国胜利。国民党一败千里，解放军长驱直入。广大新解放区，干部奇缺。为了巩固新政权，做好新区的建党、建政、支前工作，党中央确定从老解放区抽调部分干部随军南下。冀鲁豫各地委，都按党中央决定，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南下。各村生产、支前轰轰烈烈，参军参战热火朝天。各县委、区委也都积极作准备。东阿县当时划为九个区，县委书记是宋云。我所在的古官屯是二区，区委书记是刘继昌。县委按上级指示，各区都配双套班子。才上来大家都不理解，后来，传达了上级决定抽调部分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才恍然大悟。紧接着组织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党章》

等文件，先做思想动员。这时候，广大干部兴高采烈，积极报名，准备南下。有的党员，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但也有个别干部弯了腰，思想上动摇了，家庭观念重，舍不得老婆孩子热炕头。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不愿南下。对此县委又做了个别说服动员工作，基本上做到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南下干部名单公布后，我区有一半干部抽调南下。被调南下的干部，大都是素质好，经验多，年富力强，有文化知识。抽调的干部人数不准改动，如有真掉队的，要立即补上。当时我区被调干部中，有二人垮掉，宋云同志从地委开会回县路过古官屯，听区委书记汇报后，立即批准增补我参加南下。

被调干部集中在区里，除去学习外，还都各自做了南下物质准备，和家庭话别工作。不少人的白发父母和娇妻幼子，以革命利益为重，服从革命需要，牺牲小家庭利益，支持亲人南下。有的父母鼓励儿子，南下后勇敢作战，打败反动派，

解放全中国，立功受奖，早把喜报寄回家。有的新结婚的妻子，安慰自己的丈夫，南下后不要想家，自己在家一定孝敬公婆，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留下的同志表示，一定要加倍工作，展开革命竞赛。相对来说，调出的干部工作能力都较强，这是县委高风格，顾大局的表现。南下干部，于一九四九年古历二月初六日，到县集合。县委确定将全县南下干部，统一配备成五个区的架子，一个区有十二名干部，两名勤杂人员。东阿县委机关由组织部长葛道峰带队，抽调有各科局的同志（葛道峰后改名为付秀峰）。东阿县与河西县，组建一个新县级班子框架。我区南下区委书记是刘继昌，区长杨冠众，组委刘子峰，宣委李信明，民委毕仰之，武委苗正森，社委马绪田，财助王庆良，组织干事门明月，宣传干事邵良勤，青年干事李怀信，妇女干事王君，通信员冯云平，炊事员陈××（记不清了）。临离别东阿时，县委和广大群众，热烈欢送，其场面非常感

人。南下干部，都肩负着故乡人民的重托，离开和平建设的环境，冒着枪林弹雨，长途跋涉，到江南新区去工作。这是暂时的离别还是永诀？谁知道？谁能说？历史证明，我们南下的同志，没有一个给故乡丢脸，有的同志，南下不到半年，就牺牲江西资溪，至今长眠他乡。

二、集训菏泽

根据党中央决定，在老区组织五万三千名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各县南下干部，都到六地委所在地聊城集合。东阿县由付秀峰、王子奎、赵庆德带队；河西县由张金屏、孔焕章、刘发文率领，于当天到达聊城。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第六地委组织一个将要到新区接管一个地区的干部队伍，编入南下支队第六大队。以谢鑫鹤、王富海、曾宪辉等同志为领导，共七百余人。曾宪辉任大队长，谢鑫鹤任大队政委。各县又以县为单位组建中队。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中队长；各区为班，

区委书记任班长，区长任副班长。东阿、河西合并组成六大队五中队，明确张金屏为县委书记，吴大角为县长，王子奎为武委主任。

在聊城集训一周后，便向区党委所在地菏泽进发。我们这个中队到菏泽后，住在曹大庄。在这里我们学习训练了二十多天，主要内容有：学习党的新区政策；整顿提高思想觉悟，为南下扫除思想障碍；训练渡江、渡河、沿独木桥以及夜间急行军的基本知识等。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革命随时献身的思想和意志，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都认为，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要勇往直前，决不当逃兵，一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但我们南下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生活。新区和城市工作是一项新任务，如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是不能顺利开展工作的。为此，我们都如饥似渴的学习新区和城市工作方法和党的有关政策，以便接管城市，开辟工作。学习军事常识，

更是我们急中之急。我们南下干部，大都是土生土长，长期做地方工作。要说发动群众，反奸反特打游击，可能还会一些，要在新形势下适应大兵团作战，过正规军事生活，就有些困难了。特别急行军长途跋涉，更不合格。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军事知识，艰苦锻炼自己。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家都刻苦磨练自己，逐渐克服自由散漫的农民习气，积极参加操练，学习紧急集合，快速打绑腿、背包，越障碍，泅渡，走独木桥，作防空演习等。天天泥满身，汗满背，手脸时常挂彩。我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大家都心情愉快的做准备，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政治、军事训练结束测验时，五中队都达到了合格。这更提高了大家的情绪，每个人都意气风发，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新的战斗，踏上南下征程。

三、艰难的行军

菏泽集训结束后，即随大部队南下。临行前，区党委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党委领导和广大群

众，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头戴八一军帽，胸佩人民解放军胸章，雄赳赳，气昂昂的行进在大部队中，感到无限的光荣，无尚的自豪。出发前，领导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并要求南下干部轻装前进。把体质较弱的部分女同志，动员留守。首长说：从菏泽到长江边，长途快速急行军，要靠两条腿。为避免敌机轰炸，尽量夜间行军，问大家有没有信心。大家齐声答：“有！”声音震动山河。

进军的第一天，就赶上南风怒吼，刮的天昏地暗，狂风卷着飞沙打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眼睛不敢大睁，眯缝着眼还流泪。大风阻挡着前进，行一步，退半步。等到风头过去后，已经延误了进军时间，只好日夜兼程。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行军，脚上都磨起了血泡，走起来一跛一拐，等走到朱集子车站，上了火车时，大家又来了精神。我们大都是初次见火车，很新鲜，几天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当天下午，火车到达碭山站，国

民党的飞机，轮番前来轰炸，火车不能正常前行。走走停停。到固镇时，我们下了车。上级命令我们，徒步前进，直奔蚌埠。蚌埠大桥已炸毁，到处留下战争时的创伤。我们住在郊区某村，学习过南方生活。由于这里集结部队较多，油盐柴米都挺缺乏，有时我们弄点野菜掺和着吃。几天后，上级命令我们南下支队向合肥挺进。

到达合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接着直插安庆。从合肥到安庆，一路上全是黄泥地面，又遇着天天下雨。白天敌机轰炸厉害，不能大部队行军，只好夜间前进。最难走的那段是从走马岗到九祖坟。那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大雨下个不停，大家没有雨具，没有照明，脚上都穿着自带的步鞋。黄泥路又滑又粘，泥泞难行，脚插进泥里，费很大劲才拔出来。一不小心，就来个嘴啃泥，背朝天。有不少人，被泥巴粘掉了鞋，找不到，只好光着脚前进。一路上队伍传着：“小心，注意，别跌倒！”“同志们加油！”往往一句口

令没传完，就跌一跤，浑身湿透了，再跌倒在黄泥地上打几个滚，简直成了泥人。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个个精神非常愉快。雨稍停，部队原地休息，由于天黑地滑走错了路，只好又返回一段另走。天亮时，我们停在一个村子，大家相对一看，都成了泥人。穿的新鞋，有的有帮无底，有的破烂不堪，更有的完全赤脚，一夜才走了十余公里。这时感到浑身寒冷，疲劳和饥饿侵袭着我们。我们只好停下休息。等把衣服烘干，把黄泥整掉，稍事休息，疲劳还没有完全去掉时，又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再抖精神，冒雨前进。我离东阿时带的六、七双新鞋，已全部报销。战友王庆良支援了我一双新鞋，走上砂子路，不到半天，底就磨透了，真可惜。

经过艰苦的行程，到达了安庆北的铜城地区，待命过江。为了确保南下干部，能跟上大部队渡过长江。上级命令我们，再一次轻装。动员大家把棉衣、棉被的棉花抽出来，送给老乡，只带点

过江后够几天用的炒米、炒面、食盐等少量生活必需品。集结待命几天时间里，我们又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共中央关于“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等。大家更加心明眼亮，坚定了随第二野战军五兵团胜利渡江、夺取新胜利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先头部队打响了渡江战役。突破了国民党不可战胜的长江天险，摧毁了江防工事。我们南下干部支队是第二梯队，被安排在二十三日拂晓渡江。二十二日下午，奉命从铜城地区出发，一路跑步前进，急行军几十华里，晚十点到达安庆市。没有休息，又接到

命令一小时吃完饭，整队到达江边待命过江。

夜幕沉沉，江风习习，寒冷阵阵袭来。急行军汗湿的衣服，冰冷的贴在身上，时时打寒颤。我们卧在江防隐蔽处，互相挤在一起，靠体温取暖，等待着渡江命令。时间一分一秒的过着，这样显得特别长。江南人民，也一定象我们一样，盼望着天亮，盼望着解放。

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渡江命令传来。快天亮时，我们按秩序上了木帆船。船不大，一船只能坐十儿人，最多二十人。上船后，木船在急流中颠簸，我们都非常紧张。按照命令，我们都把背包和米袋摘下来放到船上，防备万一落水便于泅渡。船刚到江中心，部队的号声、敌机的轰鸣和长江涛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紧张到了极点。老舵工沉着地掌着舵，要我们不要惊慌乱动。船划得更快了，乘着满江的大雾，我们安全地渡过了长江天险。刚上岸，就接到命令，要我们急行军离开江边，五十里内，不许停下，以防

敌机轰炸。我们立即乘胜急进，向着新的目标奔去。

四、进军瓷都

过江后，无暇观赏江南景色，就按照上级命令向景德镇进军。沿途都是国民党丢弃的武器弹药。有些南下干部过农村穷日子过惯了，农民意识挺浓，看到怪可惜，捡拾了一些，准备战斗时用。哪知当天接到命令，严禁随便打枪。致使同志们的背包越来越重。

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沿途一些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带着一些贵重包裹箱笼，惶惶如丧家之犬似的南逃。我们战士的腿，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当他们看到我们秩序井然，不抢不拦后，才又向北走或主动向地方接收人员靠拢。对于继续顽抗的敌人，我们则坚决消灭。过江后不远，我先头部队，就消灭了一股负隅顽抗的敌人。及至我们赶到时，硝烟还没散尽。武器、弹药满地狼籍，到处是死

尸和死马，他们全做了蒋家王朝的牺牲品。

过江后天气时阴时晴，有时还下雨，我们风雨无阻，日夜兼程，由于过江时轻装，带的粮少，米袋渐渐空乏，有时一天仅吃一顿饭。沿途老百姓，又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坚壁清野，逃避隐匿，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有些人体力渐渐不支，有些不服水土，染上了疾病。为了保证不让一个战友掉队，我们发扬了人民军队团结友爱的精神。我组杨冠众同志，重病不能行走，又没有担架，我们就借了一扇门板，轮流抬着他走。本来就累够了，这以来，更加重了负担，使行军速度降低。途中休息时，区委书记刘继昌召集了我组紧急会议，号召党员起带头作用。大家团结一致，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精神，保证不拖大队后腿。并改变担为车推的方法，减轻体力消耗。我们在一个无人村农家，好不容易找到一辆手推车，没有主人，不能付钱，只好写了一张借条，放到原处，让其到当地政府领取车款。车子有了，

但会推车的只有两个人，刘继昌书记首先推起了车子，我们不会推的用力拉。车子一边坐病号，一边放背包，这样比过去又快又省力，加快了进军步伐。

平道上推车容易，可上山就困难了。偏偏去景德镇需翻越百丈岭，我们只好拿出东阿人的犟劲，不怕苦，不怕难，学武松打虎的精神，决心征服这座大山。我们采用人海战术，轮番作战。为了减轻病号痛苦，上下台阶时，就把车子抬起来。我们都是来自黄河岸边，在平原上长大，徒手爬山都有困难，何况又推车抬车，连续行军，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当时要问我们什么是幸福，答案一定是坐下来睡一觉。但情况不允许，敌人的飞机还时常俯冲扫射，溃军、土匪也时常捣乱。我们只好咬着牙关，使出吃奶的劲，终于胜利的翻越了百丈岭。到达景德镇时已是万家灯火了。

景德镇是江西东北重镇，与佛山、汉口、朱

仙合称我国四大镇。自汉时即有冶陶，南朝陈时已有制瓷业，宋时景德年间设官烧瓷充贡品，是著明瓷都。我们在那里修整了几天，观看了市容，到处都是上等瓷货，连洗脚、便盆都是好瓷器。景德镇是老苏区，我们到达时，虽然刚解放，但秩序井然，商号店铺照常营业。老百姓见了我们也无拘束，十分亲密，和安庆地区不同。那里的人民在国民党反动宣传下，受到欺骗和蒙蔽，与我们距离较大，沿途群众跑了不少。而这里的人民却不跑不藏，主动给我们送柴米蔬菜，安排部队住宿，给我们介绍敌情和当地风土人情，亲如家人。这在精神上给我们极大安慰。在景德镇我们练习吃大米，过南方生活，了解掌握江南人民风俗习惯，为接管地方政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怀支持下，大家的体力迅速恢复，病号得到了治疗和安置，除严重病号留下继续治疗外，其余立即奉命向接管地区进

发。

五、接管贵溪

随二野五支队南下的六大队南下干部工作团，将要接管的是江西省贵溪地区。从景德镇步行去贵溪时，大部分没有了鞋穿。我们也学习打草鞋，穿草鞋。但穿不惯，走不多远脚就磨起了泡。有的这个血泡没好，那个血泡又出来了，我们的脚整天伤痕累累。但胜利的喜悦鼓舞着我们，接管目标在即，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大家以苦作乐，互相鼓励，克服了不少障碍和困难，终于于五月初到达江西贵溪。因贵溪地委要迁水陆交通重镇鹰潭，我们又随之从贵溪赶到鹰潭。

到鹰潭后，迅速建立了中共贵溪地委和行署，开始了对所辖各县市的接管工作。地委和各县市领导成员是：

中共贵溪地委：谢鑫鹤 吴肃 王富海
曾宪辉 郭绍汤

临川市：张金屏 吴欣斋 刘法文 孔焕章

临川县：张武云 沈廷梅 杜竹林

东乡县：姚传德 于振东 李建华

贵溪县：张玉环 刘 影 姚 英 张登文

石 光

弋阳县：崔芳亭 孙紫芳 单志远 曹子奎

资溪县：付秀峰 王子奎 赵庆德

进贤县：刘学民 彭怀德 倪建华

金溪县：房建平 吴大觉 刘秀峰

余江县：段絨三 张佃一

干部分到各县以后，接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迅速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政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级政权；收缴散兵游勇和各级伪政权的枪支弹药；征借公粮应付大军过境；吸收知识分子创办军政干部学校，扩大干部队伍。我们在鹰潭学习政策和熟悉情况后，迅速编排去各地接管。东阿和河西去的干部，建成十个区的架子，由付秀峰为县委书记、王子奎为县长，带东阿三个区架干部共五十一人，去接管资溪县。

贵溪地区属山区，面积大，人口少，交通不便。山上丛林密布，很宜于土匪隐藏，土顽势力挺大。我们在部队的掩护下，离开鹰潭向资溪进发，资溪县在山窝里，全是茂林修竹，羊肠小道崎岖不平。我们劈荆斩棘，攀附而行。当天晚上宿营高山之巅的尚清宫。

尚清宫是著名的道教宫观，住有许多道士，据说张道陵曾在此传道。建筑辉煌，香火极盛。前后有好几个套院，大厅修得很宽敞，能容纳两个团人马。里边道士，有真的有假的，夜间我们警惕性极高，以防突袭。好在这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次日黎明，又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过尚清宫前行，小路更窄更荒芜。到处是大树、草莽、竹林，一不小心，就会碰到树干和竹子上，手脸常被划破。

进入资溪县境，第一个接管目标是高阜，是原国民党的大乡所在地，是个重镇，配有敌人防守，属我们三区接管。当我们进军接近高阜时，

敌人保安警备队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负隅顽抗，垂死挣扎。我部队立即火力反击，枪炮齐鸣，敌人仓惶逃往县城，很快结束战斗。到高阜了解了敌情后，决定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集中力量，直插县城。我们采取了武装进击与政治攻心相结合的策略，尽量减少伤亡。到距城仅十几里的镇上时，县长王子奎同志，以一个团的番号给伪县长徐曰泰打电话，要他命令部下，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当时徐正在街上理发，他万万没想到我们进军这样神速。他的反动本性不改，妄图据城顽抗。他发没理完，即逃回县府，组织武装抵抗。我们劝降失败后，知道将有一场恶战，于是我们即高速前进，准备歼击敌人。我们跑到县城后，迅速包围了县城，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我们从北门攻进城后，敌人在南门突围逃走。当时天近黄昏，地理环境又不熟，也没有再追。次日，即在全城大张旗鼓的宣传我党我军各项政策，向县城各界人士和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宣读人民解放

军约法八章，并且强调指出，只有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拥护人民政权并愿意参加建政工作，党和人民政府既往不咎，保持原职原薪，确保其生命财产安全，并可立功受奖。假如继续顽抗，阴谋破坏，坚决镇压。经过宣传工作，政策攻心，不少没逃走的旧人员，情绪逐渐安定。有些人明确表示拥护新政权，愿意立功赎罪。原老苏区的一些群众和地下工作者，也纷纷向我们介绍情况，欢迎新政权和解放军。县委在充分掌握资溪全县概况和敌情后，建立了县政府，接管了政权。接着把三个区的干部，分配到各区去工作。我随刘继昌书记接管了资溪一区，即城关区。区长杨冠众病未全愈，暂在城留守，县委确定由王庆良任区长，调韩言明任财政助理员。

我们到新区后，情况不熟，人地两生，水土不服，语言又不大懂，给接管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特别当时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大多数南下干部得了痢疾、疟疾和疥疮。政权初建，百废

待兴，医疗条件又差，得不到及时治疗，大家忍着病痛，积极开展工作，争取群众。

护送我们进城的部队，不几天又奉命调走，接受新的战斗任务。资溪地方上，虽有人民武装，但为数极少。我们初接管时，大军压境战败或吓跑的敌人，藏在与福建交界的深山老林中，探听到大军开跋，乘我们尚未立稳脚跟，和当地流氓土匪头子曾皋九勾结在一起，立即卷土重来。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残忍，于六月二十二日拂晓，包围了我三区所在地高阜。以王月亭区长为首的六名南下干部，全部壮烈牺牲。他们在与敌人战斗中，英勇顽强，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高贵品德，至今，他们的英名尚被当地人民所传颂。接着敌顽于六月二十六日，又包围了一区重镇乌石乡，我区长王庆良正与民运主任毕仰之、组织干事门明月、区委干部冯云平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遭到敌人突袭包围，与敌血战到底，全部牺牲，埋骨在异乡土地。

敌人的凶狠残暴，使我连续受挫，县委立即召开会议，总结教训，改变被动局面，采取主动向敌进攻。在敌人尚未完全肃清的情况下，建党建政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改变策略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集中全县优势兵力，向敌顽老巢围剿，给敌以沉重打击。有的被打垮投降，有的被消灭，小股残匪向尚未解放的福建省逃去。资溪逐渐走向平静，各级政权逐步站住了脚，扎下了根，立于不败之地。各项工作，才更好的全面开展。我们的每个胜利，都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啊！

六、继续向西南进军

正当我们，一手抓武装建设和剿匪，一手抓建党建政开展群运支前，打开了局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之际，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将这里的建设工作，全面移交四野同志，随二野五兵团主力继续向大西南进军，去接管尚未解放的新地区。

向大西南进军，意味着离故乡越来越远；意

味着刚安下家，生活刚稳定又要进行长途行军，特别是刚倒下的战友，尸骨未寒，大仇未报，就舍下他们而去，心里有些眷恋和不安。我们从五月八日进资溪，到八月三十日离开这里，共计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一百一十二个昼夜，和这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来时我们东阿籍五十一人，走时只剩下四十一人。有十人牺牲在江西，埋骨在资溪。但我们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解放全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抗起战友的枪，背起背包、米袋，向着更艰苦，更危险的未解放地区前进。

九月十一日，我们集中在赣东北区党委所在地上饶，进行了整训。开忆苦会，讲革命形势，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继续革命，进军大西南的意志和胜利信心，又开始了艰苦的行军。贵溪地委南下干部，编为西进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是曾宪辉，大队政委是谢鑫鹤与吴肃。大队下设十个中队，队长和政委依次为：

一中队：	队长刘 影	政委张玉环
二中队：	队长孙紫芳	政委崔芳亭
三中队：	队长张佃一	政委段緘三
四中队：	队长房建平	政委付秀峰
五中队：	队长于振东	政委姚传德
六中队：	队长彭怀德	政委刘学民
七中队：	队长李 英	政委张金屏
八中队：	队长谢吉魁	政委张武云
九中队：	队长付明余	政委吴志远
十中队：	为军分区机关。	

经过一个多月的急行军，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到达贵州镇远地委所在地。镇远原为国民党“督察专员公署”，接管后地委、行署驻此。辖十二个县，总人口一百余万，少数民族占多半。幅员辽阔，经济落后，人民挣扎在饥寒线上。三天后，中共镇远地委、行署、军分区即宣布成立。吴肃任地委书记，王跃华任专员，曾宪辉任军分区司令员，与此同时接管各县的干部，立即奔赴

各地接管。由于五个县尚未解放或刚解放暂由部队接管，南下干部只接管七个县，这些县均属交通要道或中心县。地委又从原东阿干部中，抽回部分同志，与资溪来的同志仍组成一个县三个区的架子，去接管台江县。仍由付秀峰任县委书记，王子奎任县长。

我们接管台江后，立即展开工作，征借粮食，收缴武器，建立武装，恢复交通，争取旧职人员，加强民族工作。在深入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收缴了大量武器，平息了土匪暴乱，取得了一个个胜利。

十二月中旬，趁我主力进入四川作战之际，那些不甘灭亡的国民党残余，勾结地主武装，土匪流氓，纷纷从深山老林中钻出来，向革命新生政权反扑，猖狂袭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打家劫舍，破坏交通，煽动和欺骗群众，造谣诬蔑，提出“杀死北方老干部”的反动口号，用地方主义，挑起民族纠纷。我们没被土匪大暴动所吓倒，

而是拿起枪杆，武装人民，发扬游击战的光荣传统，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武装斗争。三月十三日，东阿干部李荣亭在锦屏被敌人捉住，关在监狱七天，敌顽用尽了各种酷刑，坚贞不屈，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必胜”！慷慨就义。三区武委主任苗正森，于五月中也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

敌人除去武装叛乱之外，还派大批特务投毒破坏，派间谍打入我内部残杀。县长王子奎就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的。

我们初到贵州时，环境十分恶劣，既要和残匪土顽斗争，又要做好民族工作，团结广大群众，还要克服水土不服，语言风俗的不同，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和生活相当艰苦。但我们东阿南下干部，个个都表现很好，实干苦干，用出色的成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当地扎下了根，把贵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保卫它，建设它，使它逐步走向繁荣和富裕。

七、老骥伏枥

四十年岁月，三千里行程，已使我们由青壮年步入了老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们虽在江南安下了家，但对故乡仍十分怀念。当年我们一起接管资溪的五十一名同志，初到南方时，先后有十一人牺牲在土匪的屠刀下。有十五位同志，由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积劳成疾，又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过早的离开了人世。现健在的尚有二十五人，大都年过花甲或古稀，大部离休。仍在工作岗位上拼搏的，已为数不多。

初到镇远地区时的炉山县，现在改为凯里市，已成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几乎全部同志，都经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用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行动，谱写了个人的人生历史，得到贵州省领导和群众的信任，被赋予较高的荣誉和职位。其中有省级的，有地级的、有县级的、局级的。但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为人们做出了贡献。如今，一

些离休的老同志，离休不退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在奋发向上，保持晚节，继续做奉献。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我们都在这南国之乡，安家立户，但情丝仍在追忆着故乡。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园。我们愿意为故乡做出应有奉献。愿南北两个故乡，共同富裕起来，成为四化建设的典范。

故乡啊故乡，深深地怀念您！请接受南下儿女的革命敬礼！

注：本文作者，曾任区社会委员、县公安局长、县委副书记、黔东南自治州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已离休，东阿县姚寨乡八里王庄人。其妻子李健英，为本文提供不少材料，共同回忆而成。

附：南下资溪干部情况表

姓 名	性 别	调出时任职	曾任职	现 况
王子奎	男	县武委主任	县 长	51年牺牲
王月亭	男	一区副区长	区 长	49.6.22牺牲
王庆良	男	七区财助	副区长	49.6.26牺牲
毕仰之	男	一区民运委员	区民运委员	49.6.26牺牲
阎明月	男	三区干部	区委组织干事	49.6.26牺牲
冯云平	男	六区通信员	区委干部	49.6.26牺牲
田万芝	男	一区干部	区民运委员	49.6.22牺牲
李发兴	男	一区干部	区武委主任	49.6.22牺牲
符继尧	男	一区干部	区社会委员	49.6.22牺牲
李玉斌	男	一区干部	区宣传干事	49.6.22牺牲
王培森	男	一区通信员	通信员	49.6.22牺牲
苗正森	男	三区干部	区武委主任	50.5牺牲
付秀峰	男	县委组织部长	昆明市副市长	69年病故
雷元泽	男	县交通班长	情报站参谋	86年病故
徐传胜	男	县交通班	县酒厂支书	76年病故
高玉秀	男	县委通信员	公安科长	病故
赵庆德	男	县民运主任	县公安局长	78年病故
房兆升	男	税务干部	地区医院院长	病故
王光梓	女	收发	贵阳市轻工干部	89年病故
尤祥芹	男	警卫员	派出所长	68文革故
王义泽	男	司务长	保育院长	83年病故
黄德臣	男	县财科	邮电局长	病故
刘子峰	男	区组织委员	县委组织部科长	病故

高雪峰	男	二区书记	县委书记	85年病故
梁福迎	男	一区干部	县委管理员	病故
张学荣	男	一区财助	县财办主任	病故
张振河	男	县委组织干事	县人大副主任	离休
朱明	男	县府秘书	省税务局长	离休
宋继元	男	民政科长	县宣传部长	离休
张孝先	男	银行经理	调出较早	离休
于宪文	男	区长	县政协副主席	离休
邵清法	男	区社委	县委副书记	离休
刘继昌	男	六区书记	县委书记	离休
李怀信	男	六区宣传干事	宣传部长	离休
邵良勤	男	县委交通班	县委副书记	离休
韩言明	男	税务干部	省民政厅处长	离休
马绪田	男	六区副组委	县委副书记	离休
宋怀让	男	三区干部	情报站长	离休
王玉荣	男	二区武委主任	组织部长	离休
杨道棠	男	一区民运委员	县团委书记	离休
刘金城	男	六区副宣委	县人大副主任	离休
张维文	男	一区副社委	贵阳市法院院长	离休
秦广智	男	一区副宣委	县委副书记	离休
孟宪斌	男	区财助	副科长	离休
秦连广	男	一区书记	副科长	离休
房玉河	男	一区通信员	军分区后勤部长	离休
王雨亭	男	一区组委	副县级	离休
刘玉英	女	三区妇干	区妇干	离休
朱明海	男	一区副青委	黔东南州广播学校校长	在职
咸德明	男	县委秘书	52年调重庆	不详
李信明	男	六区宣委	49年7月脱逃	不详

人生处处有青山

——纪念南下殉难烈士

曲绪宏 王广锋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我南下干部随二野西进兵团，到达江西东北，接管鹰潭地区。东阿干部中队，奉命接管资溪县。

资溪县刚刚解放，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但首要任务，是筹集粮食，收缴武器，建党建政，支援大军过境，继续挺进大西南。这批东阿优秀儿女，到地方后，来不及休息，即投入繁忙的接收工作。原东阿南下干部第一班，奉命接管资溪三区。

资溪地处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西麓，东高西低，群山耸峙，山地广袤，人口稀少。这里曾是老苏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土地革命时期，全县惨遭杀害的烈士八百余人。其手段

之惨忍，令人发指。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一连兵力护送二野南下支队六大队五中队五十一名同志（即东阿干部南下工作团），来资溪接管政权。当我军行至高阜时，王子奎县长以加强团长的名义打电话敦促国民党县长徐日泰投降。徐当时正理发，慑于我军威力，发没理完即率部拒降，逃往山上负隅顽抗。我军发起进攻，激战一小时，解放了资溪县城。

东阿干部到达资溪，冒着硝烟，带着泥土，随即奔赴各区乡接管。原东阿南下干部一班接管了资溪三区；原三班接管了一区，原二班接管了二区。这样以来，干部分散后就显得势单力薄，战斗力就不如集中起来强大的多。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利用资溪交通闭塞和我南下工作组人少地生及尚未建起强大的武装之机，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疯狂的围攻新生政权，杀害我南下干部。

土匪头子曾皋九，在县城解放时，曾被国民党县长徐日泰封为“江西省民众自卫军第七师第五团代理营部少校团副常备第一连连长”，令其“与邻县友部配合，坚守资溪，以谋反共复国之大业”。在五月八日我解放资溪后，即上山为匪，勾结国民党残部军官廖运昌、王象起和光泽县土匪蔡絨三、金溪匪首向理安等残渣余孽，拼凑成“闽浙赣反共救国靖卫总队”，曾皋九自任大队长兼“代县长”，组织“反共地下军”，造谣惑众，破坏新政权建设，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我三区区委书记秦连广和组织委员王雨亭，去饶桥乡开辟工作，当晚没回高阜区部。区长王月亭和其余同志，在区里忙着建政工作。同志们忙碌了一天，刚躺下睡觉，敌人就包围了区政府。区长王月亭立即带领全体同志，奋勇抵抗。当晚天气漆黑，天下着小雨，通往城里的电话线，已被土匪割断。区部内有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而包围我区部的敌

人，却有三百人，六挺机枪和许多步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部浴血苦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人气得暴跳如雷。于是他们又施出了更毒辣的手段，弄来了汽油和柴草，绑成无数火把，采用火攻。

区政府的围墙是砖的，但屋子全是木楼。蘸着汽油的火把，纷纷投入院内，顿时木楼燃成熊熊烈火。王月亭立即组织突围，我南下干部、区宣传委员李玉斌，在突围时壮烈牺牲。其余同志突围后，纷纷被俘。敌人百般拷打和折磨，个个昂首挺胸，坚贞不屈。敌人怕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群众义愤和反抗。立即将我被捕南下干部和当地新吸收的干部、战士，用粗麻绳捆成一串，被押解到武夷山孔坑甘港一个山头上，将他们集体活埋在一个炭窑中。临死时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革命胜利万岁”。壮烈的口号，震撼了群山。敌人将其逐个摺在一起，继而把削尖的木桩插入烈士心窝，然后再加锤击，洞穿其

躯再加土掩埋。残暴兽行，亘古绝寰。

惨案发生后，王子奎县长立即报告上级，部队派一连主力驰援，朱明海随部队前往。他们在群山荆棘中攀登摸索，爬上高高的悬崖，大山十分幽静，土匪已逃匿他山。他们找了许久，后来才发现了露在坑外的麻绳。顺绳找去，拨开覆盖的一层山土，才找到了烈士的遗体。朱明海当即和部队同志，找来一长方条石，权作碑碣，立就在就义的坑前，用毛笔写上了殉难烈士的名字，含泪告别了亲爱的战友。

数年后，朱又和几位同志，专程从贵州来到江西，重新给烈士立了石碑，刻上了他们的名字。东阿儿女，为了解放全中国，将青春献给了人民事业，以青春妙龄，将遗体埋葬于异乡。

六月二十六日晨，土匪又以众多兵力，包围了我一区住地乌石乡政府。当时，南下干部在乌石开展工作的区长王庆良等四人，工作到深夜，刚刚进入梦乡，就被激烈的枪声惊醒。及至起来，

从窗缝中望出去，大批敌人已进院子。他们立即组织火力突围。四个人冲出一条血路，边打边撤。敌人包围的水泄不通，并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用机枪向我干部猛射。王庆良等经过激战，全部壮烈牺牲。用他们的鲜血，浇灌了南国解放之花；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了铺路基石。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东阿南下干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全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一切，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品德。他们的英雄行为和献身精神，将载入史册，流芳百世。他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虽死犹生。建国后，资溪县党委和政府，在县城山青水秀的地方，建起了烈士陵园。东阿南下殉难十烈士遗骨，已迁葬陵园，静静的长眠于苍松翠柏与鲜花茂竹丛中。当朱明海等人前不久又去陵园瞻望牺牲的战友时，看到不少群众和少先队员们，虔诚的献上鲜花，庄严的宣誓入队。他们

手抚罹难战友的墓碑，心潮滚滚，情思万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四十年的岁月过去了，烈士为之献身的事业，壮丽辉煌，一日千里。不论是资溪还是故乡东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富国强，河山锦绣，政通人和，土匪绝迹。当烈士九泉之下目睹祖国的繁荣景象，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欣慰。

为共和国的缔造而牺牲的南下战友们，安息吧！你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资溪牺牲南下干部名单列下：

姓名	南下职务	资溪任职	牺牲时年龄
王月亭	区长	资溪三区区长	30
田万芝	区民运委员	资溪三区民运委员	32
李发兴	区武委主任	资溪三区武委主任	29
胥继尧	区社会委员	资溪三区社会委员	29
李玉斌	区宣传干事	资溪三区宣传干事	23
王培森	区通信员	资溪三区通信员	22
王庆良	区财政助理员	资溪一区副区长	28
毕仰之	区民运委员	资溪一区民运委员	23
门明月	区组织干事	资溪一区组织干事	24
冯云平	区通信员	资溪一区通信员	22

从上述情况看来，这些殉难战友，牺牲时都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他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离开父母，离开家乡，英勇拼杀，埋骨异乡。没有辜负东阿父老乡亲的培育，没有辜负东阿党政领导期望。年青的朋友啊，当你今天能安静的学习、工作时，可千万不要忘记长眠江西的烈士，应知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应时刻牢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珍惜今日的幸福，继承烈士的遗志，更好的建设祖国，为人民利益去奋斗终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我们含着眼泪写这篇文章时，除怀念之情外，更激发了我们向英雄学习，为四化献身的热情。要以实际行动，保卫烈士用生命创建的人民共和国，以慰烈士在天之灵。

注：本文根据凯里老干部座谈会提供材料综合整理而成。

向西南进军

——从江西到贵州

马绪田

一、继续前进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我们东阿南下干部配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接管了江西省资溪县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立即开展了各项工作。正当工作深入之际，溃逃深山的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卷土重来，向我们疯狂反扑，袭击刚建立起的人民政权，杀害我革命干部。三区区长王月亭及其他五位同志被活埋，一区区长王庆良等四名干部也惨遭敌人毒手。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们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给敌人以严厉打击，很快使形势安定下来。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了新命令，把原管地区移交给四野的同志，随二野继续西进，去接管新解放区。是年八

月三十日，我们在资溪县战斗、工作了一百多个日夜之后，撤出资溪到地委集中。

二、上饶待命

在鹰潭地委集中后，又到上饶区党委。在上饶，我们中队住在郭门村，属郊区。在区党委集训，主要学习当时的形势，党的政策。当时江南几个著名城市都已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筹备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待宣告成立，形势喜人，我们都欢欣鼓舞。“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主席的指示激励我们前进。经过学习，我们做好了西进的思想准备。

西南地区，将要被接管的有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从西南地区地下党提供的资料看，党的工作最活跃的是四川，其次是云南，贵州最差，贵州几乎没有地下党领导的红色游击区。从物产上看，四川省，称“天府之国”，交通和风土人

情都优于其他省。在接管哪个省的问题上，干部的思想犹豫不定。这时区党委召开了干部大会，申云浦同志到六大队传达了精神。他首先讲了全国的政治形势，然后着重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指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纪律。共产党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级组织决定我们进军贵州。会后，组织干部讨论，统一思想，最终，我们一致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决定了去贵州后，我们认真阅读了有关贵州的资料，了解贵州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概况。贵州省属于高原山区，政治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是多民族地区。过去这里的人民长期被国民党统治着，群众生活极端艰难，连盐都吃不上，挣扎在死亡线上，工业产品奇缺，群众生活原始成份很大。地域的差别是历史形成的，贫困地区的人民一旦从政治上得到解放，积极性将更高，改变贫

穷面貌，主要依靠人的因素。我们从思想上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增强了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干部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充实了一些在江西招收的新同志。我们在做了必要的物质准备后，又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三、踏上征程

离开赣东北乘车到达南昌，在南昌住了几天，就来到九江，在九江改乘轮船去武汉。一路上，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心里无比欢欣鼓舞，忘记了旅途的劳苦，观赏着如画的山山水水，在九江上船以前，各中队抽调部分人员，由领导干部带队组成先遣队。我们这个中队由王子奎县长带领，他们先走一步为后续部队筹备粮草、安排宿营地。我们一上船就遇到了问题。一是饮食方面。江西的同志吃惯了大米饭，而船上只备有馒头、大饼，他们吃不下。船上不能做饭，船要靠岸借群众的锅灶做饭，这样只好让江西的同志拿馒头、大饼去向群众换大米饭吃。这种饮食不习惯的问题，

我们过江后也遇到过。我们到达安徽、江西主产大米地区，没有面粉吃，每到吃饭就发愁，吃惯了面食、小米，吃大米饭，总有吃不饱的感觉。到达赣东北，地委根据干部的实际情况，用大米到浙江省金华换来一批面粉，我们才高兴地吃上白面。江西的同志吃不惯面食，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二是住宿问题：我们乘坐的所谓轮船，就是刚缴获的国民党运送坦克用的货船，并不是客船，没有床位，底层象广场一样。上船后，同志们打开背包铺一满地，男女挤在一起。尽管如此，大家心里非常满意。不管怎样，不背背包步行就够幸福的了。我们第一次看见并坐上这么大的船，船大且比较稳，没有颠波感。白天欣赏着长江两岸的风光，饱览大自然的美景。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夜间，由于人多，空气不流通，大家感到心里闷的难受，热的无法。脱去外衣还是无济于事。后来确定在底层坐的同志可以到船顶上通通风，

我们爬上船顶，船顶象个大坝子，凉风习习，刚到时心里感到格外舒畅。到船顶没多久，天气突变，刮起大风，接着是暴雨如注，风雨交加，躲藏都来不及，慌忙披起的雨具也被风刮跑了，我们都被淋的浑身是水。

四、抵达武汉

船到武汉，我们改乘轮渡到武昌。住在武昌修整学习。在武昌，正赶上人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我们心情很激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培养起来的干部，有多么地自豪啊！

武汉三镇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我们这批干部大都来自农村，住进城市，心里无比喜悦。武汉，有著名的黄鹤楼，古代曾吸引了多少文人雅士到此观赏，吟诗、作画。现在，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就住在黄鹤楼脚下，尽可以登楼远眺，饱览大江南北的无限风光。早上，我们迎着红日

登上黄鹤楼，有时，还在上边开小组会。尽管没有过去文人雅士那种闲情逸趣，我们能在这名胜上商讨大事，心里无比舒畅。为了使这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扩大视野，更好地了解祖国，提高对革命事业的认识，组织上安排我们到纺织厂等大二厂参观，了解工业生产情况，通过参观，我们提高了许多。中秋节，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虽在武昌，异土他乡，却没丝毫生疏之感，因为我们没有离开祖国、人民的怀抱。我们这个组原来是轮流值班做饭，在武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上等面粉、肉食、鲜菜等，在这传统的节日里，为了让同志们吃上水饺，我和赵学荣（女同志），主动承担做饭任务。在武昌修整学习期间，我们生活较好，同志们的身体得到了恢复，达到了养精蓄锐的目的。

五、入湖南，到湘潭

从九江到武汉，这段长江水域辽阔，我们乘

坐的大船，后从武汉到长沙，再到湘潭，随着水路越来越窄，我们不断地更换船只，换中号的，小号的。船小容易出毛病，当船行驶到新堤时，船出故障，靠岸维修。我们只好在新堤住几天。由于决口水刚退下，新堤没有蔬菜，满街都是鱼，各种鱼都有，又很便宜，我们北方干部见都没有见过这么鲜美的鱼。开始吃鱼时，同志们都很高兴，但吃过几顿后，大部分同志都吃伤了。在长沙因换船，我们又休息了几天，在这里，吃上了甘美清香的柑桔。漫步在长沙街头，解放初的长沙，已是焕然一新。长沙的市容整洁，商场、店铺有秩序。百货、五金、瓷器一条街。大城市，没有使我们留连忘返，我们心里装的是战斗岗位，是工作。换了船，向湘潭前进。

六、艰难行程

离开湘潭徒步向贵州挺进，是四九年南下、西进行军史上最后一段长途跋涉，最为艰难的行程。为了克服长途行军中的困难，在湘潭作了充分的

准备。一是动员进一步轻装，因为从湘潭到贵州不能行船也没有车坐，只能沿着湘黔公路步行，东西带多了，会影响行军。把多余的，不能丢的留在湘潭留守处；二是动员身体素质较差的干部及部分女同志留守湘潭；三是动员少带衣物，多带食粮和食盐，以及民族地区喜爱的用品。出发前，我们中队配备了一辆大马车，区级干部只能向车上放十斤东西。从湘潭出发，一路没有修整，直奔目的地——贵州省镇远地区。

这次行军，正值十一月初，天气已开始逐渐变冷。贵州的下半年阴雨天较多，路途中是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走路非常吃力，在洞口县境雪峰山，我先遣队歼灭了一股企图阻挡我们入黔的敌人，傍晚，我们到达雪峰山脚下，拂晓开始爬山。我们除了翻越这座湘西名山以外，别无捷径。翻山这天，细雨濛濛，整个山被细雨大雾所笼罩，眼前尽是团团白雾，也不知山有多高多大，爬山时格外小心，稍不在意，就有滑倒滚下的危险。

经过一整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在天黑下来之时到达宿营地。我们到达目的地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接到命令，派人去把大马车从半山腰放下来。中队的大马车因路滑，困在半山腰，不敢下山，我们几个年轻的同志前去帮助，雨水淋透了衣服，不怕冷。滑倒了，再爬起来。终于完成了任务。行军中，往往是衣服淋湿了，自己暖干，暖干了又淋湿。到宿营地后，有时因水泡得脚发胀，鞋子都很难脱下。

将要进入贵州境内，我突然得了疟疾，身上发烧，热得烫手，但又冷得受不了，还要随队继续前进，不能掉队，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过了晃县浮桥，进入玉屏县境，整整一个下午，我身上发烧，口渴难忍。中队部得知，给我找了两片奎宁，没水，只好干吃。大兵团行军，公路多宽人多宽，一掉队就找不到自己的部队，所以，不管多么艰难我也要跟上部队前进。赶到玉屏宿营时，我已是疲惫不堪，蹲下就起不来了。饭都

不想吃，晚上兵团宣传队演出更是不能去看了，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居然好了，真是万幸。

十一月十日，我们的宿营地点是镇远焦溪。我们到达焦溪时，天还没有黑，群众也没有跑。我们刚住下，就有一个小伙子挑着一担柴禾来卖问他要多少钱，他也不说话，眼一直盯着我们准备做菜用的盐上。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早知贵州人民长期受缺盐之苦，就让他自己拿盐巴好了。他伸手拿了象姆指大的一小块，我们说太小了，多拿点，他说什么也不敢，我们拿起一块鸡蛋大小的盐巴，塞到他手里，他仍犹豫。我们解释说：“是真送给你的”。他才一再道谢，高兴离去。第二天，我们终于到达了镇远。

七、接管台江

西进支队随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向贵州进军，我们六大队五中队到达镇远就算完成了西进任务。具体接管工作的分配，到达镇远才开始。地委决定我们这个中队接管台江县。我们这个中队

是由南下干部40余人，江西干部10人和150团九连组成，决定接管台江后，干部作了适当调整。根据接管工作的任务性质，除县委一定要保持一定力量之外，县政府照顾重点科局，着重建设三个区领导班子。公安局的力量比在江西资溪时大大加强了（县政府除公安局外，其他科局大都是一个），充实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从区里调来了王雨亭、马绪田，从专署公安处调来郑爱民担任保卫队长，从县政府调来尤祥芹，从江西来的干部中调来叶正清同志。公安局力量的加强，使我们顺利接管台江有了保证。人员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开始了解台江的情况。从台江到镇远给我们接头的地方上的几位同志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台江县的基本情况，我们随之进行修整。向台江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就绪，组织上又分给我一个具体任务。专署赵专员从华北一直带到镇远的一辆大飞轮自行车，送给王子奎县长。子奎同志要指挥整个县的工作。有了自行车，便于开展

工作。从镇远到台江，不象咱家乡即便没公路，小路也挺方便。可这是山区，没有公路，出门就翻山越岭，行路十分困难。子奎同志把车子又交给了政府组，因政府组老同志多。最后落实到了公安组我身上可带车爬山行军十分艰难。任务既然给了我，只有克服困难，把车子带进台江。不管路上翻越多少鼓楼坪，猫猫坡，能骑就骑，能推就推，实在推不动就扛。除了我的背包和盐粮带外，我还把叶正清同志的粮盐带子也放在车子上，从镇远到施洞过鼓楼坪坡时，一上山我就掉了队。车子难推，越来距队伍越远。快要到施洞河时，才赶上了队伍。从施洞到台江过了巴拉河，翻越猫猫坡，这猫猫坡是一个台阶，如果光是车子，问题不大，再加上两个人的粮盐袋，足有七八十斤。无奈，我只好使足力气，扛着车子往上爬。爬到顶一看，部队早无影无踪了。来到九里十三湾到台江县城这段路上，我能骑车子走了，直到德胜关，我才又赶上部队。当欢迎部队入城的群

众看到我骑的自行车时，人们的注意力一下集中到了我身上。这里太闭塞了，甚至还没有人见过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成了台江县城第一辆自行车。

我们东阿籍西进干部四十多位，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完成了西进任务，接管了台江县。我们没有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我们为自己在共和国成立之际做出这点滴贡献而感到自豪。

离开故乡四十年了，现在将我们南下情况作一回忆，向故乡人民报告：您派出南下的儿女们，没有给故乡丢脸，在缔造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使命中，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初离家乡南下时的誓言，做出了一个人民干部应做的贡献。

如今，我们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和这里的民族和人民溶为一体。我们虽大部已到花甲之年，但一定戒骄戒躁，保持晚节，革命到底。故乡啊母亲，请放心吧！

（于凯里）

清末民初东阿教育

鲁 莽

教育是立国之本，任何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与教育事业的兴衰有密切关系。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人才，但人才一定蕴育在知识之中，一个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全赖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代的教育，基本上沿袭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更加僵化。随着政治的腐败，教育的神圣，也被褻渎，有些目不识丁的地主豪绅，为了装潢门面，也都出钱捐学位。因此，导致了清王朝的更加腐败丧权辱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传入，满清闭关自守的大门，再也关不住了。民间有些有识之士，开始自发的集资办学。有些基层官员，为了息事宁人，也顺应人民意愿，采取较为宽容政策。因而，清末东阿也出现了不

少书院，义学，尽管所学内容仍冲不出旧教育的藩篱，但总算注入了一点新的东西。

戊戌变法前后，官办学官有“明伦堂”、“明德斋”、“亲民斋”、“射圃”。设教谕一名，训导二名，二年一贡，额设廩膳生员二十名，增广生员二十名，附学生员无定额。每岁科二试，各取新生十五名。武生岁试一次，取二十名。生员膳食，由学政衙门供给。

书院有七处。多为乡绅官宦所建。野斋书院，在旧县李谦故居；东流书院，东流泉上洪福寺内；柯亭书院，在县城东北，知府白栋建；少岱书院，县治东城隍庙路南，王、张二乡绅捐地七十三亩创建；冉子书院，在泰安荆门；洪范书院，在洪范池西，道光九年廩生陈廉、于建亨、附生于万安捐修；安平书院，在张秋镇运河边，知县白栋建。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讲学；首事一人，负责生产生活事务；学长一人，负责学习事宜。

私塾义学有：授书义塾，设在庙头村；聚英堂，在关山村，由刘来风、于壁等，献田五十七亩，作义学费用；步瀛书舍，在西芦村，周建恒倡建，义学学田二十九亩；召殿村义学，城西南六十里，张令璜创建；养正斋，西城将军庙内，李贤书创建；乐天义塾，设在香山，为当地士绅筹建；利仁义塾，在大吉城，有捐增义学学田三十亩。凡入义学者，不缴学费，塾师授课薪金，均由学田出。官府不付银两，家长不担学费。是民间自动集资和捐资所办。尤如现在的民办小学。或由某个体户捐资兴办的私立学校。

书院之制，创于五代时期，明、清又有所发展。特别清末，东阿县书院多至七处，为东阿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书院主要负责人为何称“山长”呢？这是因五代教育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学生称他为“山长”，因而后代沿此称呼，直至戊戌变法时，始改“山长”为监督或院长。下设提调一人，负责管理学院一切事务；

监院一人，负责指导学生学习的事宜。

书院学生有年假和旬假。年假结束后，学生要举行开学典礼，要全体恭恭敬敬的“拜文昌”，即向孔子牌位礼拜。每逢朔日（初一、十一、二十一），都要举行“谒圣礼”。在学宫中，开学时，知县等要员，都亲临训话，以示重视，上述礼仪，均实行叩拜礼。

书院课程内容，以经解、史论、诗赋、杂著四科讲修。甲午战争失败后，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原则，将原四科改为学生课外研读，另设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科。并规定不论学修何科，均需学算术，有了一些科学和自由民主气息。光绪廿五年（1899年），又将课目改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图画、体操。对于学生成绩，采取月考或期考，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

书院学生年龄不受限制，大的五、六十岁，小的十几岁，以自学为主，不限制学生选读的课

程，没有修业期限，学生可任意停学，走了也不发给文凭。书籍和学习用具由书院发给。必备之书有《皇清经解》、《皇极经世文编》、《资治通鉴辑览》、《文史通义》、《宋儒学案》、《明儒学案》、《韩昌黎文集》、《苏东坡文集》等。戊戌变法前，采取分教研读；变法后实行讲堂教学。讲授时间一般为每次二、三小时。有时每天上两次课。除经学、文学外，其余课程及教科书，各分教自编讲义，学生自抄。直到民国时期，西城书院改县立高级学堂，算术等还是油印讲义，发给学生学习。清末民初的书院中，学科学为荣的空气较浓，觉得教育救国，科学领先，因而学生攻算术的较多，对文学热忱不大。辛亥革命后，有些学生，参加到旧民主主义革命行列。

民国建立后，书院有的停办，有的易名，有的解散。有不少村庄，开办了私塾。私塾者，乃民间自由组合，延请教师任教，约定薪金，有的给银钱，有的给米、柴等。入学的儿童采取集资

聘教。所学课程，多为儿童启蒙文化。常读书为：《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等，还有的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小学纂注》等。私塾中不学算术，没有体、音、美，也没有正规上课时间，采用旧教学法，以背诵为主。对学习不好的学生，施以体罚，大多用木板打手掌心，动辄将手打肿。东阿废除私塾，是在民主斗争之后。私塾中出来的学生，大多毛笔字写的较好。

书院、义学、私塾，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是清末、民初东阿教育现状。由于东阿较闭塞，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所以文化教育也比较落后。据民国二十三年统计，全县仅有小学二百七十五处，高小四处，女子小学八处。

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一九〇三年，知县季桂芳，率先将谷城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其他书院和义学，也竞相仿效。辛亥革命成功后，普

遍改成小学或高小。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统计,全县尚无一所中学。东阿教育是比较落后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女生入学人数激增。学校课程也有较大变化。新、旧八股一律取消,一切从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出发,功课设置,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的,一扫过去学、用脱节现象。据一九五二年统计,全县在校学生三万五千四百三十人,女生有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一人。现在,全县有公立小学四百七十二所,国中十五所,师范一处、职业中专两处,民办中、小学一百零三所,远远超过了过去。

国家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这是富民强国之本。教育投资逐年增加,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原则,基本上做到了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还建有高中和中专,每年向高级学校和社会输送不少人才。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不少家庭,都把教育投入列入正当开

支项目，而且数字不断扩大。这正是我们民族希望之所在。

注：本文系根据走访八十岁以上老人和参考旧县志、教育志综合而成。

西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

王 玉

东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又叫西城高小，是东阿最高学府。它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我县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个学校毕业。有的从政从军，有的经商任教，其毕业学生，遍布全国，大陆和台湾都有。他们来信，来访，深深的怀念故乡母校，希望故乡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做出较大贡献。

西城高小，由于历史变迁，社会沧桑，目前已不存在。其校长，教师、学生，也已年过花甲，古稀耄耋，有的且已做古。现根据部分知情人的

回忆口碑资料，综合整理如下，错讹处请当事人不吝赐教。

一、庙学科举制的废除

自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后，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二科，其子杨广继位后，始置进士科。到唐代，科举制度逐渐完善，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并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当政后，科举制更得到重视，亲临殿试，增设武举。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相继沿袭。宋以后，科举均用经义。明、清则以《四书》、《五经》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严格依照朱熹的《四书集注》等著作。

封建科举制度，越来越僵化呆板，培养的人才，多是腐儒，不能安邦治国平天下，到清朝后期，外国的洋枪洋炮，终于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科学文化，进入中国，给科举制度以

极大冲击。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七年（1930年）清朝皇帝下命停武科并重试，先在县级停止科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在全国全面停止。沿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最后废除。

为适应科举取士制度，各县都设庙学，在文庙内，县试录取生员，集中学习，准备应府试、院试。文庙，者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设，为纪念文宣王孔子而立，简称文庙。东阿县科举时生员学习，即在文庙，故称庙学。庙学中负责祭祀和教育的官员，称教谕，或训导。科举废除后，学官裁撤，庙学制度除。庙学制时，因受名额限制，培养人才寥寥无几，且多为官宦世家子弟，平民百姓极少。

二、谷城书院的沿革

文庙内的明伦堂十分狭小，容生员也较少。为适应历史发展之需要，鸦片战争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县汪南金，在学官西，创建

谷城书院，前后三区，瓦舍楼房计三十余间，局势宏敞，岁考时作考棚用，平时士子课读。因教谕、训导所居文庙甚近，没有聘请教师。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屡战皆败，割地赔款，人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强烈要求改革。光绪十五年（1890年），知县胡建枢莅任，率邑名人同治壬戌拔贡王善泽，将书院竭力整饬，进行扩建，募集资金，兴办教育，延请名师讲课，想走教育救国之道。这在封闭腐朽的清末，人们愤世嫉俗，苦闷徬徨的期待之中，无疑注射了一针清凉剂，颇受人民欢迎，东阿士风大振。当时求学的贫家子弟，抱着匡世救国之心，历尽艰辛，求学上进。学监（即后来的校长）王善泽，也严以教读，热心教育。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历史的潮流，却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知县季桂芳，奉命将谷城书院改名“高等小学堂”。因为

当时入学的人，仍沿袭科举时代生员习俗，年龄不受限制，去学堂念书的多是青年人和成年人，所以一般民众称它为“西城大学”。

西城高等小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刘象鼎，东城衙前村人，清末秀才，山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曾任省十一中国文教师，师范讲习所所长，是一个热心教育，较有威望的知识分子。

谷城书院时期，讲授的课程是《四书》（一）、《五经》（二）、《课孙草》（三）等六股、八股时艺，培养秀才、举人苗子。还讲习五言、七言律诗，教育学子作一些无病呻吟的呆板古诗。改成高等小学堂后，教学内容，逐渐有所更新，虽然仍学习《四书》、《五经》，但增加了《史记》（四）、《古文释义》（五）和《算术》、《地理》、《自然常识》。教学内容较为新颖和丰富多彩，培养的学生，能掌握一些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对推动社会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这时的作文，多为论、说、辩、义。学生敢于论

时局、提见解，一扫过去脱离政治，唯命是从的腐儒病态。当时为鼓励青年人去高等小学堂，不但供给食宿，而且书籍，笔砚等文具，全由县衙劝学所发给。教育的这一发展，标志着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培养大批人才。民国十八年（1929年），东城张氏女子小学，改成二高，西城高等小学堂，则被命名为“东阿县第一小学”。学校设校长一人，高级教员五人，初级教员一人，招取高级学生三个班，初级学生一个班。校长为徐子廉，现我县铜城赵徐人，著名教育者，建国后曾在一中任教。教员有姜芳斋（茂田）、黄仙洲（传盈）、姜正伦、薛教泉、张尚和、初小教育是李玉英（秦本端妻）。每班学生四十五到五十人。这时的教学内容，有较大更新，课程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政治、自然、音乐、体育等，培养的学生，较为符合社会需要。当时高

小八級學生，有姚仲明、李明山、姜湘南、黃貫一、史成漢、曲傳玘、田洪儒、王吉榮、曲傳薰、黃會三、李長清等。高小畢業後，姚仲明、李明山、曲傳玘同時考上了濟南鄉師，並在鄉師入黨。其他學生，有的從教，有的從政，有的從軍。當時教學質量是比較高的。我縣七十歲以上的知識分子，大多是一高培育的。

“九·一八”事變後，學校更加活躍，抗日救國的空氣越來越高漲。學校逐步擴大，校舍擴建到六十餘間。課程又增加了衛生、體育、美術等科目。1931年10月，校長換岳克寒（樹梅）。教員先後有李耀卿、蘇德清、姜芳齋，張盛齋、雷保香、秦效尤、汪洋、姜湘南、黃會三、徐繼堂等十五人，這時有高小班學生四個班、初小學生兩個班。共有學生二百五、六十人。校長岳克寒，兼任衛生、公民課。教育科長，先為姜風儀，後換王占一。教師月薪，高小教師為二十至二十二元；初小教師十五至十七元。當時的教師，抱

着救国、建国、爱国的思想，教书育人，兢兢业业，为我县培养了大批人才。

一九三五年冬，一高发生学潮，几个进步青年教师，汪洋、苏群、姜湘南等，印发传单，反对王占一贪污腐败，重用私人，要求革新教育，从东阿传到济南、北京等地，震动了国民党东阿县政府，他们以暴力镇压学潮，将四名革命教师开除，黄会三、张盛斋等也陆续离开了学校去三师学习。岳克寒一九三七年八月离任，校长换秦效尤。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次年十月占领县城后，组建了日伪县政府，教育科长为程寿山，一高校长为姜芳斋。一高在日寇铁蹄下，艰难度日，饱经风雨，直到日本投降，国内战争再起，隔河对峙，才被迫停办。

三、西城高小——东阿文化摇篮

纵观东阿西城高小历史，经过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战争频繁，民族多难之秋，它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改革，为我县培养了

不少人才，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时期，做出了不少贡献。有些学生，已成为我党、我军著名领导者如姚仲明、汪洋等。他们有的健在，有的已为人民献出了生命。这是西城高小的光荣和骄傲。

西城高小，继承和发展了民族文化，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是东阿文化的摇篮。当时全县还没有一处中学，它荟萃了东阿人才，不论教师和学生，教与学都是认真的。凡是在西城高小上过学的学生，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每当回故乡，临东阿，都要到西城母校的遗址，去凭吊一番。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缅怀学生时代的黄金岁月与启蒙老师。

“抽刀断水流复流”，历史的长河，在迂回中奔腾前进，潺潺的狼溪河，古老的石桥，会诱发您无限的情思。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中，教育越来越显得重要，教师地位不断提高，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正在兴起。教育担负着建设祖国，

昌盛民族的重任，愿西城高小的教风、学风给我们以启迪。

注：本文根据走访原西城学生李永呆、韩新岳、姜宪德、曲传玘等人综合而成。

国民党东阿县政府 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

一、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沿革及负责人。

历史教育行政机构，名称不一，县级的名称，清称教谕、训导，民国元年改名“劝学所长”，民国二年改称“视学所”。民国十二年始定为教育局。

各个历史时期	职 称	姓 名	工 作 时 间
民 国 时 期	劝学所所长	张仙臣	民国元年
	视学所所长	周茂荃	民国二年至民国四年
	视学所所长	石樞堂	民国三年至民国六年
	视学所所长	刘蔚堂	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
	教育局局长	刘蔚堂	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六年
	教育局局长	黄子干	民国十七年
	教育局局长	刘维诰	民国十八年
	教育局局长	尹庚祚	民国十八年
日 伪 时 期	教育局局长	姜虞廷	民国十九年
	教育局局长	姜正伦	民国十九年
	教育科科长	王占一	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 (1933—1935)
反解 动放 派区 进时 攻胡	教育科科长	程寿山	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 (1938)
	日伪教育科长	梁传宣	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1939—1940)
	日伪教育科长	李笃祐	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 (1940—1941)
反解 动放 派区 进时 攻胡	日伪教育科长	张宗廷	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 (1942—1943)
	国民党教育科长	胡伯烈 (三青团 主任兼科 长)	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 (1946—1947)
	国民党教育科长	孙宏毅	民国三十六年 (1947— 1948)秋, 解放东阿城。

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的情况

民国时期县设教育科，内设科长一人，下设科员三至四人。科员分别担任庶务（会计）视导、政治思想教育等。

学校领导方面：校内设校长一人，副校长一人，教导一人，训育主任一人，庶务主任一人，三青团支书一人，国民党支部书记一般由校长兼任（校长也有非党员者）。

其组织系统：

正、副校长	训育主任：负责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
	教导主任：负责教师课程分工和教学工作
	三青团支书：负责学生中三青团工作，监督革命进步学生的言行。
	庶务主任：负责全校师生财务管理和生活费用。

庶务主任：负责全校师生财务管理和生活费用。

注：本文系根据查阅档案资料和走访有关人士整理而成。

东阿回民

鲁 莽

东阿现有人口三十七万，由汉、满、回、彝、苗、布依、朝鲜七个民族组成，除汉族外，其次人数较多的是回族。全县回民有三十六户，九十二人，分布在县城和六个乡镇。多数聚居古官屯村，有十五户，五十人。

回族，又称回回，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七世纪开始从波斯、阿拉伯迁入中国。十三世纪随着元帝国的开拓西侵，大批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西部，和汉族、维吾尔族等杂居，明朝时逐渐形成一个民族。他们使用汉文、汉语，信奉伊斯兰教，保持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顺从”。伊斯兰教又叫清真教、天方教、回教。是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为世界三大宗教之

一。唐高宗时（公元651年）开始传入中国，沿香料之路与丝绸之路，中西商贾往来不断，逐渐兴盛。其教义主要有：信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天使，信《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并信仰“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该教规定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观等为教徒必遵的功课，并对人生衣食住行死葬等行为，有不可违反的清规戒律。

古官屯回民有四姓家族。最早来古官屯定居的为王姓。他们的先人在清朝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从东平迁东昌，从东昌行医到古官屯，如今已传十代。其后东昌闸口大街姓金的人家迁入古官屯，从事屠宰和饭店业。清末、民初，蒋姓和李姓相继从东昌迁到古官屯，他们从事面食业，以卖烧饼为主。逐渐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回民点。旧社会由于战争和灾荒，两户逃荒去关外，一户被充军，一人被抓劳工去日本，回民过

着受迫害的贫困的日子。直到建国后，回民才迎来了兴旺发展的时代。

伊斯兰教分两大派系：“逊尼”、“什叶”。我国属“逊尼”派。东阿回民从聊城迁来，而聊城回民则大部分从山西迁来。伊斯兰教的理论信仰为“伊玛尼”。实践为：五功、五典、五大原则、五大禁令等，主张限制高利贷，解放奴隶、强制施舍，提倡平等，为达此目的，《古兰经》中宣扬，籍神的力量惩戒邪恶。其活动场所是“清真寺”，阿拉伯语“麦斯吉德”意即叩拜真主的处所和传教、处理宗教事务的地方。大寺谓“主麻”，独立自主，组织健全，三大节日在本寺进行；小寺阿语谓“扫麻”，为附属下院，没独立自主权力，三大节日要到大寺会礼。清真寺主持教务的人曰“阿訇”，“阿訇”人选实行聘任制，由清真寺长老，征求回民意见，聘请回民中德高望重、品学兼优、能为人师表者担任。一般任期三年，成绩好者可连任。其报酬由寺内收

入或回民集资供给。阿訇以下设伊玛目（率领穆斯林作礼拜的人）、海提卜（古兰经宣讲者、礼拜时念呼图白的人）、穆安津（清真寺内按时召集信徒作礼拜的人）、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穆扎为尔等。教务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伊斯兰的重大节日有三：一曰开斋节，又称肉孜节，伊斯兰教历定为十月一日，规定每年有一个月“封斋”，斋月的最后一天为“开斋节”；二曰古尔拜节、伊历十二月十日为古尔拜节，又称宰牲节，阿拉伯文译音为“献牲”；三曰圣纪节。伊历三月十二日为圣纪节，纪念创始人穆罕默德诞辰，相传此日又是其逝世之日，故称“圣忌”。除这三大节日外，还有阿拉伯日、登霄夜、拜拉台夜、盖德尔夜、法图麦节等。后面这些节日没有那三节隆重。除三大节必须到大寺去作外，其余可在小寺或分散举行。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民族是一个人们的共

同体。回族一般都信仰伊斯兰教，但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只是回族，在我国还有维吾尔族、哈撒克族、撒拉族、乌孜别克、保安等十几个民族。东阿的回族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因为人数较少，没建起清真寺，大的法事活动，去聊城或从聊城请阿訇来做。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要互相尊重。回族和汉族长期杂居，有些习惯已改变的与汉族相同，有些则还保持着他们的民族特色。回教的“主麻”（七日会礼）及三大节日时，到清真寺礼拜的回民，男的多戴黑、白帽，已婚及老年妇女戴黑、白纱盖头，未婚青年女子戴深绿色盖头。我县回民，平时衣著和汉人同，去聊城做法事活动时，才换上民族服装。

生活方面，凡食禽、兽动物，均需由寺司夫或海里凡等教务工作者按“断喉法”司宰，放血后方可食用。忌食病和自死的动物及一切动物的血。所食或所卖肉类，清洁卫生，这是清真饭馆

兴盛的原因之一。不准食猪、狗、驴骡及一切性情恶劣的凶禽猛兽肉。忌与食以动物性与形来定。猪相丑性情，习性肮脏，所以教规严禁食用。不食猪肉，是回、汉民族的主要区别之一，在这方面处理不好，常常会引起民族纠纷，这是我们应当牢记的。必须尊重回民这个习惯。驴、骡、马肉也不食。螃蟹也忌吃，厌其“横行霸道”。当我们宴请回族朋友或去回族家做客时，要懂得回族习惯，尊重回族风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友谊和团结。回族最珍贵的礼品谓“油香”，是用白面和豆油、花生油制成。婚丧嫁娶、宴请朋友、和解隔阂等，都用“油香”。敬客送礼，乐善布施，也用“油香”。贵重“油香”，是对“安拉”最大的虔诚。所以，当回族朋友送汉族“油香”时，要十分珍重的接受千万不可回绝。

回族一般是同族联姻，因为其信仰相同，生活习惯相同，便于使家庭生活和谐。然在汉、回杂居地，特别在我县，回民较少的情况下，回、

汉通婚，在所难免。一般汉族姑娘到回民家后，都要过回民生活，方可保持家庭和睦。男女相爱，登记结婚举行仪式时，要请阿訇来主持婚礼，作为证婚人。阿訇当场写“一扎布”（即证婚词），然后询问男女双方，女方回答“达丹”（没意见），男方回答“盖不里楷尔丹”（我承认新娘的意愿），就算结为夫妇。阿訇将礼糖撒向新郎、新娘和观礼人，即算完成结婚大典。

回族丧葬实行速葬、土葬。不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幼，在家停尸均不得超过三天。出殡前报知寺务人员或请阿訇主持“落地”（亡人从床上放到地上）。出殡日，亡人在“榻布”（沐浴工具）上，经清水冲浴干净，刮去毛发，用白布裹身，盖上“榻布”罩，抬上床架。阿訇和亡者儿女、亲友肃立致哀、念悼词。悼词内容大体为：亡者一生，在世效法穆圣，敬天、爱人，现已归根复命，归主吧！即起灵去墓地安葬。送葬亲友手持安息香送殡。古官屯回民，有公用丧葬器具，

吊唁时不学汉族拿火纸吊丧，而是拿馒头、饭、菜等到丧家，表示悼念。其墓穴南北向，深九尺，长六尺，宽二尺，有的砖砌，有的土坑，上用盖板和二十四块土坯盖上，然后封土，称“深葬”。冥祭日为七天、百天和周年。冥祭日拂晓，由阿訇带领死者亲属去墓地念经，悼念死者，寄托哀思，并奉献“油香”。

回族亲人间称谓，和汉族基本相同。唯称祖父为“巴巴”，曾祖父为“老巴巴”。父亲为“达”，死后哭“爹”。称大伯、二伯为“大达”、“二达”。称姑为“吗吗”。互相平辈之间称“老表”。

回族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文字，特别在回汉杂居地，一般都说汉语，用汉文。真正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礼拜或做法事时，才诵读阿文经卷，用阿语。通常在回民大门上贴的回文横幅，名叫“都阿”，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祈祷”。回教餐馆或肉食店，招牌上写着“清真”，其意

义乃标榜纯洁质朴，卫生可信。“清真”乃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常用语。概明、清时，中国伊斯兰教学者介绍该教教义时，曾用“洁净无染”、“真乃独一”、“至清至真”和“真主原有独尊，谓之清真”等语，称颂该教所信奉的真主。故伊斯兰教又称“清真教”。“清真”于是就成了回民的独特标志。当你步入挂有“清真”标记的餐馆时，不要违反回民的教规。否则，要遭惩戒。

回族祖先，多是从阿拉伯、波斯经商来中国，定居后，仍习祖业，善经商和毛皮加工。古官屯回民，从聊城来东阿时，有的从事屠宰业，有的经营面食业，还有的行医，大多做买卖。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和汉族一样，分得了田地，才逐渐转向以农业为主，做买卖仅以家庭付业形式出现。东阿县政府，每年拨出专款，支援、照顾回民队，认真贯彻中央民族平等政策。目前仅有十五户、52人的回民生产队，拥有拖拉机一台、柴油机三台，大牲畜十头、羊六十余只。有三分之一家庭

有了电视机。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文化水平也不断上升。现有大学生二名，高中生三名，初中生十七名，适龄儿童全部跨入了学校大门。

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古官屯回民有大多数人家，重操旧业。六户开起了饭店，五户经营屠宰和肉食业，并正在计划在县城建一处具有回民特点的羊肉馆，从事涮羊肉等面食加工业。

古官屯回民，自从聊城迁来东阿后，回、汉两族，和睦团结，没有发生过大的民族纠纷。回民生活习惯，得到汉族尊重，这里的汉族没有大汉族主义。他们还共同修了民族团结路，栽植了民族团结树。县党政领导非常关心他们，和他们共同劳动，促膝谈心。回民中有一名人大代表、一名政协委员，他们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上的政治活动，在四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根据回民蒋振生、金昌玉口述，又参考有关资料综合而成。

祖国，我回来了

马文义 口述

曲绪宏 整理

我家住在东阿县古官屯乡刘海村，名叫马文义，今年七十三岁。是一个曾入日本籍的中国普通妇女。随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在日本东京住了三年。如今，落叶归根，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返朴归真，恢复了中国国籍，仍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公民。我感到无限的幸福，无限的自豪。有人说我傻，有福不会享；有人说我憨，别人争着出国出不去，你却往穷窝里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有我的主意。我不留恋那豪华的日本国东京，不羡慕那轿车、高楼和鱼肉。我觉得这布衣粗饭比东京生活甜美；低矮土房比高楼大厦舒适，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美嘛！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虽然现时经济还跟不上日本，穿的戴的，吃的，用的，还不如东京，但这总是自己的

家啊！而且比三十年前被迫闯关东时生活要强多少倍。我们的国家，是会在将来赶上和超过外国的。虽然还要待很长时间，我这辈子恐怕看不到了，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会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幸福的。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我们的民族勤劳善良，充满智慧。只要全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重视科学教育，是大有希望的。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当飞机载着我，离开东京，跨过大洋，飞到北京时，我看到了蓝天白云下的北京故宫，新起的大厦，熟悉的同胞时，我热泪盈眶，激动万分。我高兴的喊着：“祖国，我回来了！”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婆，没有文化，也没有超人的本领。如何去的日本？又为什么回来？说起来话就长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古官屯乡马海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受尽了旧官府的压榨和豪绅的盘剥，

再加地势低洼，土地瘠薄，涝时一洼水，旱时白碱窝，常年挣扎在饥寒线上。一九三二年，我十四、五岁，鲁西发生灾荒，生活更加困难，在万般无奈时，随父母背井离乡，逃荒去闯关东。经过乡亲的帮忙，我们一家在哈尔滨安下了家。一家人给人家下苦力，勉强维持生活。

亲帮亲，邻帮邻，穷人帮穷人。在共同的艰苦生活中，我认识了刘海的刘兴光。经人介绍，于一九三五年结为夫妻。我们都是穷人，又是同乡，靠劳动谋生。由于我们过惯了穷日子，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我们又都年轻力壮，日子过的还可以。

当时东三省已被日本占领，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已伸向关内。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穷兵黩武，向国内几次招兵，以至最后把妇女儿童，也被迫、被骗驱赶到他们侵略的战车上，输送到中国 and 亚洲被日军侵占的所有国土。有不少日本平民百姓，被骗来中国后，日子也并不好过。他

们也同情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反对军国主义者，但他们无能为力。我的日本邻居井口夫妇，就是被骗来的日本老百姓，他们在哈尔滨做小买卖，维持生活。由于孩子多，生活也不好。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是没有仇恨的，都受压迫，都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越陷越深。兵源枯竭，供给困难。日本人寺田市川先生，本是在一所学校教书，曾被迫动员学生应征入伍，为军国主义者当炮灰。后来也没逃幸免，被迫带妻子远涉重洋，来我国齐齐哈尔开荒种田，为侵略战争，提供给养。后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节节胜利，日本侵略者快到穷途末路。为了挽救其灭亡命运，在做垂死挣扎。寺田在齐齐哈尔被迫入伍，和妻子分别。苏联红军和东北人民抗日武装，联合作战，打垮了日本关东军，寺田被遣返俘虏时，送回了日本，和妻子长期断绝了音信，寺田以为妻子已死，后来又重新婚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寺田的妻子，携带出生七个月的孩子寺田俊一，在中国政府的命令下，往哈尔滨难民所集中，准备遣返回日本。在战后混乱的齐齐哈尔车站，母子失散。其母痛不欲生，对制造这场战争的日本当权者，极端仇恨，就地参加了东北抗日人民武装部队，在部队做卫生员，一干就是六年。

襁褓中的寺田俊一，被一日本人携带到哈尔滨难民所时，已饿的奄奄一息。被开饭馆的井口夫妇遇到，抱回家去，准备抚养。但他孩子多，生活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再抚育一个孩子。于是，他们将孩子抱到我家，送给我抚养。我一看孩子的衣服上，拴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和出生年月，知是日本孩子。有的邻居同胞也劝我，日本杀了我们那么多儿童，几乎灭亡了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能抚养他们的孩子，不加杀害，就够宽宏大量了。民族仇恨心理，曾使我犹豫。但我看看俄的乱抓乱挠，大声号啕的

无辜的孩子，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我想，发动侵略战争，杀害我同胞的罪魁祸首，只是日本政府上层一小撮，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没有仇冤。据传说，日本人民还是秦朝时，徐福带去的童男童女繁衍的呢！再说，孩子的父母也是被迫来中国的，把自己的亲骨肉抛在异国他乡，也是迫不得已，痛苦万端，他们也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仅凭中国人的良心，民族的善良，毅然收养了这个孩子。我们勒紧腰带，给孩子雇奶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一心一意抚育孩子。

我们给孩子起乳名叫小锁，意思是吉祥长寿，健康成长。大名叫刘玉斌，希望他成为文武双全的有用人才。孩子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在他身上，确实付出了很多心血。虽然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可比亲生儿子还亲。断奶后，我天天抱着他。稍大了，我们出去干活挣饭吃，也背着他，拖着他，宁肯我们受饿受冻，也不叫他受委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带着孩子，一家三口又回到了刘海。可家乡刚解放几年，生活还有困难，但我们心里踏实，觉得这是自己家乡，虽然生活苦点，但心里慰贴。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我喂了几只鸡，补养孩子成长。孩子上学了，有时在学校给同学打架，被骂成日本仔子，回来后告诉我，我矢口否认，并给以安慰。我更加痛恨那些战争贩子，给多少人带来精神折磨啊！

一九五四年，我们二次去哈尔滨谋生。几年后，丈夫去世。要在旧社会，我们孤儿寡母又将陷入痛苦的深渊。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处处充满关怀和体贴。单位领导把党的温暖送到家庭，照顾我们，救济我们，我极力支撑，让玉斌上学。有次在学校又和同学打架，又有同学骂他是日本仔子，他大哭着回来，问我是不是他的亲娘。我说：“你说呢？”他破涕为笑。自己又觉太天真了，晚娘哪能待他那么好！但他毕竟才十六岁，我不能在他幼小的心灵

上，插上刀子，留下阴影。

在党委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下，我们娘俩给安排了较适宜的工作。若没有国家照顾，我们不会有今天，时刻在感谢党和政府。仅凭我一个女人的力量，别说供他上学、找工作，结婚生子，连生活都难以保证。

玉斌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儿媳妇娘家原籍是梁山，我们都有个乡土观念，觉得寻个山东人，合得来。后来生了孙子小刚，一家人生活挺美满。

日本加害中国的侵略战争，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淡忘了。两国的人民是没有仇恨的，还是要友好的。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关系后，有一天玉斌下班，跪在我面前，问我，他是不是日本人。我一时愕然，我怕媳妇、孩子看到不好，连忙拉起他来。趁别人不在场，我流着眼泪讲述了收养他的经过。他泣不成声，一再说，我就是他的亲娘，他一定孝顺我，使我幸福的渡过晚年，

报答我养育之恩。

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想起了玉斌的爸爸、妈妈，如果健在，也大概年过花甲了，他们对于失去的亲骨肉，也一定十分怀念。我擦了擦眼泪，告诉玉斌：“如果你有办法，可以寻找你的亲生父母，你是日本寺田家的骨血。”从那以后，玉斌就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我国政府，寻找日本亲人。

玉斌的亲生母亲在中国部队医院工作了六、七年，根据我国政府的政策规定，又回到了日本。其丈夫由于误认为她已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已另配婚姻。他母亲含着极大的悲痛，也二次结婚。是谁造成了这个日本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者，是那些战争狂人。他们不仅杀害了大批中国人，也杀害了不少日本人。玉斌他亲生母亲的后夫，几年后病故，她孤独的回到故乡千叶县，开了一个小诊所，过着寂寞的生活。中日恢复邦交，老太太兴高彩烈，

思念儿子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于是通过日本政府、中国驻日大使馆，寻找玉斌。经过双方政府的努力，终于使他们母子接上了关系。

经过两国政府批准，三十九岁的玉斌和我及儿媳妇、孙子、孙女一家六口，于一九八二年，离开了哈尔滨，去日本定居。

当飞机经过四个小时的航行，到达东京机场时，玉斌的亲生母亲，早就从千叶开车来机场接我们。她比我小三岁，今年七十了，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们母子抱头痛哭，那久别重逢，失而复得的场面，令人激动。她和她的亲友，一再感谢我对玉斌的养育之恩。

到千叶后，地方政府给安排了高级住房，政府官员、亲戚朋友都来看我们。现在东京当户籍课长的寺田市川（玉斌生父），也驱车前来向我致谢。玉斌他生母，陪着我游览了北海道等名胜，还参观了那里的农田和菜园。在那里搞农业工作，受到人们羡慕。农业再不是笨重的体力劳动，全

部机械化、电器化。

在千叶住了三个月，因为我们从中国去日本的六口人，都不懂日本话，别说参加工作了，就是平常的社交谈话都不能进行，感到极大的别扭。我们按照日本政府的安排，去东京上学，学习日语。

东京比千叶更好，听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到处高楼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令人头晕。日本人的工作和学习是紧张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住在一起，我和孙子小刚住两间房的公寓，相隔不远，一星期才能见一面。家庭做饭全部电器化，自控。主粮是大米。买米、买粮、买柴，都送货上门。我因腰疼，下楼不便，甚至买蔬菜、鱼、肉、蛋、奶，服务生都送到家，按照指定的地方放。节日穿和服，平时衣服随便。邻居之间也讲往来，他们做点稀罕的饭食，也都给我送。孩子告诉我，别人送礼时，要说“阿列斗”（谢谢）。最别扭的是语言不通。我在日本的生活，是比我

在中国好，但人活着不是光为了吃喝。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穿就是人的生活吗？不！人生的涵意远比这些大的多。在东京大饭店，我还见不少中国青年人，艰苦的做洗刷工，有的还奴颜卑膝的做下人。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们在国内叫他们做这些工作，可能就有意见。外国，并不是一切都好，月亮也不比中国亮。日本的穷人也不少。我们国家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不失误，将来会赶上他们的。何苦千方百计扒门子，去外国。

在东京生活了三年，无时无刻不想念中国。我是中国人，我不愿把我这把老骨头葬在异国他乡，我要回到祖国，还给我生我养我的东阿黄土地。当我向全家提出回国定居的要求时，全家人震惊了，亲戚朋友也不可理解。我知道我回来后，生活孤单，生活条件比日本要差许多，刘海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汽车洋房电器化，但我下定了不怕吃苦的决心，坚决要求他们送我回来。

感谢党和政府，使我又能回到故乡定居。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土地，故乡的乡音和同胞，都使我感到可亲可爱。虽然我的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在日本，但我并不感到孤单。在日本东京时的孤独寂寞感，一点没有了。处处感到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玉斌回日本后改名寺田俊一，孙子志刚取名寺田和雄，现在在日本国际商事贸易部做事。大孙女在大学学习，二孙女上高中。他们经常来信请安问好，每年来看我一次。我还告诉他们，搞点“三引进”，帮助促进东阿故乡经济发展。他们准备这样做，对养育他们的亲人和家乡做点贡献。我老了，不能做别的，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为家乡办点力所能及的“三引进”工作，还是有条件的。

有人说，你真傻，把儿子拉大了，又送给人家何苦呢？我觉得，助人为乐，舍己为人，这是祖宗的遗训，民族的美德。我如果再把孩子拉回

来，他的亲生母亲不也是孤苦伶仃吗？我还有党、政府、乡亲、侄子照顾，而她呢？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除去赤裸裸的金钱与物质关系外，人情是不如中国淳厚的。我觉得我做得还符合一个中国人的道德与良心。

我是个普通的中国人，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我鄙视那些盲目崇洋媚外、削尖了脑袋往外钻的人。他们给中国人丢脸。我是个中国人，又回到祖国故乡，是天经地义的。在东京生活虽好，我不羡慕，不留恋。对故土我充满着眷恋和希望，我愿意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并将永久的将我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还给这片大地。

从道士到战士

良 琪

我八岁时曾因家贫被迫到黄屯大庙当了道士，过了二十四年的道徒生活，并且曾在黄屯灵应观当过道长，主持过教务。现在，我是一名离

休的老战士，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如实的再现历史上确曾有过的那页生活，使年轻的朋友，从中获得某些教益，今将黄屯灵应观及我从道士到战士的人生亲历、亲见、亲闻，作一简略回忆，作为我对故乡人民的馈赠。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光辉灿烂的文化。劳动人民，在兼收并蓄的历史长河中，又吸收和改造了外来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民族特性。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外国传入的宗教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是颇大的。看戏看艺术，看庙看文化。从我国宗教的传播和寺庙的建筑塑造中，可看到中华民族的艺术造诣和文化心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影响最大的是儒教，佛教、道教。近代又传入

了基督教。过去有“以佛修身，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被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推广。汉、唐时期，三教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极力张扬，吸收门徒。北宋时，他们又互相渗透，互相溶汇，都从外在说教，转向内在修养。把他们欺骗麻醉人民的精神实质，蒙上了一层温和伪善的面纱，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我过去当道士所宣扬的道教，其作用也是如此。

道教是汉民族固有宗教，源于古代巫术，以老庄学说“道”为中心。东汉顺帝建安元年（公元142年），由张道陵于四川鹤鸣山创立，以《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皇经》为其主要经典。尊奉老子李耳（即李冉）为“太上老君”，张道陵为“天师”，南北朝时，逐步完善斋戒仪范。唐宋时各流派归于“正一派”。元朝时，“全真派”又大兴。信奉道教的教徒谓“道士”，出家的称为“全真道士”，不允许结婚；在家的谓“正一道士”，可以有家室。道教

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和儒教、佛教合流后，提出“以心为法，以神为符，以气为水”，更加符合统治者“修心”的要求，大加提倡，在某种意义上说，道教是神仙人鬼混同，巫道佛儒杂揉。炼金丹长生不老，苦修行成神作仙。它比佛教更易于麻醉人民的地方在于，佛教叫人修行来世，死后升入天堂，重在“死后”；而道教则劝人修行今世，成神当仙，长生不老，重在“今生”，教人活得痛快，比来世少一些渺茫，多一些实惠，因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它蛊惑世人，俯首听命，艰苦磨炼，以达到成仙得道，长生不老。并用阴曹地府，十殿阎罗，善恶报应，鬼怪惩罚，恐吓人民，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阳间作恶，阴间受罚。要人们相信冥冥世界，有一种超人的神力，在操纵着生灵命运，不仅管生前死后，而且管你几辈子投胎转生，极力宣扬封建迷信：为维护封建旧秩序服务。

道士的传教场所曰“宫”或“观”，也有的

叫寺或庙。黄屯大庙叫“灵应观”，也有人叫它“三官庙”，供奉着天、地、水神，亦即尧、舜、禹。其规模占地约有百余亩，其建筑大体由三部分组成。其主建筑为玉皇皋，是双层楼式庙堂建筑，玉皇大帝居楼上，表示无上权威，楼下中间为地藏王，东间为丙灵公铁象，西间为老子李耳铁象，东、西两廊坊，为阴曹地府、闹司阎王。供奉着一阎王秦广王；二阎王初江王；三阎王宋帝王；四阎王伍官王；五阎王阎罗王；六阎王变成王；七阎王泰山王；八阎王平等王；九阎王都市王；十阎王五道转轮王。道士极力宣扬和吹捧这些泥胎，说他们分居地府十殿，成为地狱的统治者，谁生前反抗统治者，死后必受惩罚。东廊坊还有泥塑的十八层地狱惨景，迷信传说中的面恶心善的五阎王门口写有对联：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横批为：久已等你。我还记得六阎王门眉横批为：你可来了。对联为：阳世间任由尔行，阴司里饶过谁来。其阴森恐怖，至今

想起尚有余悸。我初当道士后，天天与这些为伴，精神上曾受到极大摧残。

往前行即到三官大殿，为一宽敞翘角大庙，明三暗五，布满了八帅站将，全部是铁象，清朝康熙四十二年铸成。每个重约五百斤，可以看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我国冶金业的发达。大殿两旁，一九三三年又加修了钟楼和碑楼，据碑上记载，两楼为田昭林、宋传薪、刁如楷募集乡里，耗资大洋四千元重修。

最前边为观音皋，其中三个铁法神为观音、文殊、普善，两边有泥塑十二个菩萨。门上写有：出南海金童引路，驾祥云玉女随身。横批为：慈航普渡。观音阁外院中，还有一铁车轮子，传说三官老爷坐铁车来到黄屯大庙落座，故尔有人叫它“铁车庙”。

大门修的十分壮观，光绪三十一年才安的新木制大门。门上有石刻“灵应观”三个大字。

黄屯灵应观，创建于明代，清朝康熙、乾隆、

道光、光绪几个皇帝，为了维护其统治，愚弄人民，曾多次修建，附近村庄的豪绅地主也不断假意行善，用修庙塑神横征暴敛。周庄周绪成曾较大修过一次。到我当住持时，已传了七代。依次为：理、义、词、信、守、忠、良、玉、谦。我下边还有两辈。历代住持道长为：刘理真、郭义秀、杨词田、门信兴、张守春、毛忠荇、曲良琪。僧不言姓，道不离俗。和尚只有法名，不称姓。道士则称俗姓。这是僧、道不同点之一。

我记得庙里的经济，杨词田当道长时最好，有一百多亩地，喂着骡马，雇着长短工。到第四代信兴当道长时，逐渐衰败了下来，只剩下了四十八亩屯田。是不动产。田里的收获归道士，不纳粮，不交税，自种自吃。道士自购的土地，自栽的树木可以自行处理。庙产则无权变卖，由屯官监护。我当道长时，屯官为肖屯肖振廷。道士的生活，靠剥削佃农生活，不参加劳动，每人每年三套道服，一顶道冠。道士长年穿斜领道袍，

长筒布袜，头上挽髻插簪，走路迈方步，所谓“道貌岸然”即指此。其实道士的私下生活是不清高的，念经时吃斋，平时都吃荤喝酒，我的师爷还抽大烟，附近村庄的几个地主，经常去找他抽大烟，谈女人，喝酒吃肉。他死时，用最好的八仙棺材埋葬。道不离俗，道士丧葬不同于和尚，随风就俗。

过去流行着“穷三官，富奶奶”。意即道士庙较穷，尼姑庵较富。灵应观是比较穷的。最多时有道士十儿人，一般七、八个，到我当住持时有六人。当我离观参军时，只剩下良毕、玉之、谦益等三、四人。有一个长工种田，喂养两头牛，有车及其它农具，农忙时临时雇短工。遇有云游道士或和尚前来借宿，则热情招待，供应食宿。临行时，根据情况，给予资助。

灵应观信奉道教，崇拜邱、刘、谭、马、郝、王、孙五祖七尊，初一、十五念经吃斋，烧香叩拜，平时只做早坛、晚坛、念念皇经。平时大部

时间用于吹歌弹唱，练习打醮，吹奏。笙、管、笛、箫我都会。观内有两套神箱，是继承下来的衣钵，里面有象牙、笏板、法衣、钟、及各种吹打器，特别有两架好云锣，具有极高文物价值。日本人侵占东阿镇时，叫我带人去打醮，曾将神箱扣下，直到阎殿义区长第一次打开东阿城时，才要回来。可惜我走后不知其下落了。每年我在外打醮两三个月，一般带十二人，每场四、五天，布施收入大洋二十元。也培养了不少在俗的乐队和艺人，他们拜我为师傅，我也赐道名与法号，只是不入观为道士。我虽然当道士多年，而且又是最后一代住持，但我是相信不信迷信的。有人嘲笑道士，编了一付对联：论修行半点无有，讲道德一声不能。可谓入木三分，维妙维肖。

我们居住在玉皇皋后面的道房，房屋比较宽敞，院内栽满了花草树木，幽雅僻静。住持住三间正房，专有一会客大厅，客厅里悬挂着字画。迎门中堂写着：天命惟性，师性为道，修道为教；

知者后定，有定后静，能静后安。还有“蓬莱山上神仙会，函谷关中老子来”，“山中采药云生秀，洞内炼丹月华亭”，“修真养性恒耻公之不迨，谈道讲经每凡已尔为能”等许多条幅。门联则为：“近蓬莱清虚道院，远红尘绿野人家”。道房院大门上则为：“此地自清虚何必远慕仙洞，随处堪静隐无微不如深山”。其实这些都是欺世盗名之谈，真正的道教典籍，我也没见过。灵应观在东阿虽然规模较大，但与他处相比，则显得过于小了。就连和我们六祖一系的洪范池、少岱山宫观相比，也是不如人家的。

我因家贫被迫出家，心里是不相信天曹地府，报应轮回的。但我也借宗教的力量，劝化世界。去过四十个村子打醮，促进了乡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使恩怨化解；宣扬了善恶有报，要人行善积德，对坏人有震慑作用。他们不怕阳间一切，却怕死后油炸、锯解、磨研、狗吃，使其作恶时有所收敛。有些打爹骂娘，不孝公婆的，也改恶

向善。个别为富不仁之家，也建起了“积善堂”，念起了“道德经”，死后要我为他超度，对穷人剥削有所缓解。但这些仅是个别的，对那些汉奸、恶霸收效甚微。对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积极性的麻醉，却是比较大的。

东阿县委政府成立后，党政领导经常秘密来我处作思想工作，讲穷人受压迫的根源，要真正使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就要跟共产党闹革命，打碎旧世界，自己救自己。使我的阶级觉悟逐步得到了提高。抗日战争时期，我积极协助党作一些宣传工作。李长清、王仲范等人不断来我处躲避敌人的追捕。他们的言行举止，给我极大教育。共产党人才是真正解救人民的“真老君”、“活菩萨”。我以前所做的一切，是不能减轻人民痛苦的、相反的，倒使人民陷入麻木不仁地步，活着甘心受苦，死后好得超生，这不是帮了统治阶级的忙吗？虽然有时我也周济贫穷人民，但那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党的教育下，我决心走出空门，投身火热的斗争中去，用实际行动，去拯救苦难中的人民。于一九四六年，我毅然脱掉道袍，穿上军装，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把灵应观住持的神职，交给师兄良毕。我的行动受到了县委和政府的表彰。

我参军后，随县大队升级到二野七纵十九旅，离开故乡到郟城，参加了鲁西南的西太集战役、杨山战役，后又转战济宁、滕县一带。那时常是夜间行军，而且都是长途急行军，神出鬼没。有次我们穿插到国民党队列中，他们从西门进城，我们从南门进。当我们发觉后，迅速予以打击，他们还没清醒过来，我们早就离开了。

还有一次在淮北某地夜间行军，连长留我断后侦察，大部队去另一有围墙的重镇，夜漆黑一团，还下着小雨，当我一人撤出村子追赶大部队时，遇到了一个掉队的战友，我们结伴而行快到该镇北门时，看到了城墙上的哨兵，我们喊出暗号，叫其开门。对方不答，迅即开亮探照灯，机

枪齐鸣。我们二人一个滚翻滚到护城河里，河水不深，趟着泥水悄悄转到城东门外，找到一个老乡一问，知我部队与敌人遭遇后，为避免损失，已移防邻村。这时我们又累又饿，为了胜利，滚打爬摸着在茫茫的原野上。等赶上大部队，天亮时一看，我背的行军被子上，被机枪打了三个洞，但没有伤着我的皮肉。虽然当战士比当道士危险，受罪，不如当道士，特别是住持时生活安逸享受，但我却感到无比的幸福。无产阶级在解放别人的同时也解放自己。太上老君和张天师做不到的事，共产党正领导我们去做。自己正在从事救人生造浮屠的真正慈悲事业。

后来我挺进大别山后，又转到了十八兵团，去大西北作战。在解放西安城南敌人的重兵基地时，我和几个战友，前赴后继，攀上悬崖，冒着敌人枪林弹雨，把部队作战通信设施送上了最高峰，九死一生，确保了战斗的胜利进行。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受到了嘉奖，立了战功，为次年的火线

入党创造了条件。大西北解放后，我又奉命去大西南参加剿匪。在深山老林中，和顽匪战斗六个月，刚刚取得剿匪的胜利，到四川广元后不久，还没来得及休息，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燃起了战火，发动了侵略战争，我和通信部四十名战友背着四十部电台，奉调进京。准备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当我带着大西北的黄沙，大西南的汗水，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后，部队首长根据战争需要，当天就命令和我同来的三十六名战友开赴朝鲜战场。我和其他三名战友因年龄较大，被留到北京通信兵总部。我经受了战火的洗礼，顶住了入城后的香风的侵袭，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普通一兵的战士本色。在部队首长的关怀照顾下，我结了婚，成了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我已七十五岁，离休后享受着较高的待遇。扪心自问，给人民的贡献太小了。我要继续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报答党、政府、部队对我的培养，永远跟着党

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的一生是曲折的，从道士到战士，是经历一番大的抉择，是党指引我走出迷谷，奔向坦途。是党领导的部队，培养了我，教育了我，参加到解放者的行列，真正做了些替天行道的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我的一切幸福，将伴着青灯木盂惨淡的与泥胎为伴一生，既成不了神仙，得道升天，也解救不了受苦大众于倒悬深渊。人民要翻身，只有依靠自己，依靠共产党。世界上没有上帝、神仙，依靠他们解放自己是不现实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道信佛的也不乏其人，我不能强加干涉。但一个无神论者，也有宣传无神的权利。我作道士二十四年，当战士四十年。从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世界上是没有神仙、天堂、地狱的，那一切都是善良人们无力抗衡强暴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冥冥世界是幻想的构成。呼几声“阿门”，天上不会

掉下面包。念几声咒语，也没人给你奉上奶酪。我当住持时，也曾劝人行善，死后好顺利走过“成仙桥”。但那是吃饱饭后向别人布的道，是欺骗宣传。若三天不吃饭，叫我饿着肚子等老君送面包，决不会去作空头说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亨们，大都信耶稣、基督、上帝，其教意主张博爱平等，但又见有谁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普渡众生”呢？圣诞老人又拯救了多少饥寒线上挣扎的人们呢！

我从8岁出家当道士，过了二十四年教徒生活，从一个普通道士发展成住持道长，既没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也没拯救人民大众于苦难之中。香烧了无数，经念了万千，却没有使人世间的平不平稍减，作恶的继续作恶，受苦的愈来愈苦。是共产党使我从迷茫中醒来，知道了穷苦人民受苦的根源，找到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道路。使我毅然走出了古庙道观，摆脱了暮鼓晨钟的道士生活，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成长为一个

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名共产党员，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既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人民。是共产党挽救了我。南海观音，太上老君，都没有使我走上真正的人生坦途，获得一个人的真正幸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已过古稀之年，从七十五年的生活实践中，深深地懂得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劳苦人民的翻身解放。人类要摆脱剥削压迫，既不能寄希望于神仙皇帝，也不要相信天堂地狱，一切全靠自己救自己。

注：本文作者现名曲化斋，离休老干部，享受处团级待遇，现居北京总参通讯兵总部离休干部楼。原籍本县黄屯乡曲集村。

济盛斋酱园

王玉 王广锋

东阿“济盛斋酱园”始于清朝初年（1644），是东阿镇（老东阿城）出名的酱菜园和杂货铺，

规模较大，主要经营五香疙瘩咸菜、磨茄、酱瓜、什锦小菜等东阿土特产品。其酱菜小吃，远近闻名，既是个人小酌，招待贵宾之佳肴，又是馈赠亲友之礼品。

东阿酱菜，尤以五香疙瘩最为出名，曾远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过去在上海、天津、北京、沈阳等大城市的名门大户，大多都喜欢吃东阿酱菜；特别在省府济南，“济盛斋酱园”更是享盛名，曾与济宁的“玉堂酱园”齐名。

东阿老城酱菜园、原有济盛斋、济成斋、源盛东意诚斋等几处。这些名家不只腌制，经营酱菜，同时也兼做糕点，及酿造业。

“济盛斋酱园”位于东阿西城，大门口上方有一木质黑底金字、葫芦形招牌，远远看去，古色古香，典雅大方，格外引人。

“济盛斋酱园”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腌制酱菜技术是酱菜名家的传授，开始的技师是来自临清王家胡同的徐德仁、徐德奎两位师傅。技术由临

清传到东阿老城，尔后又从东阿老城传到了济宁。济宁的“玉堂酱园”始建于1714年，比东阿的“济盛斋酱园”晚建70年之久。据“济盛斋酱园”高氏后裔高连庆叙说：他家的酱园原在滑口对岸江庄营业，东阿老城早有分店，其曾祖高玉来兄弟十一人，高玉来行三，分家时，他分得了祖业——东阿西城的“济盛斋酱园”。高玉来接管“济盛斋酱园”时才十六岁。尽管年青，但他勤劳苦学，艰苦创业，惨淡经营，使酱园大有起色，非常兴隆。从此，酱菜的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扩大了销路，“济盛斋酱园”也随之闻名遐迩了。

“济盛斋酱园”酱菜的腌制分水腌、酱腌、醋腌等多种，故而腌制的小菜以适合不同人的口味而驰名。制作过程中，在倒缸、晾晒上有着严格的规范，绝不能有杂物混入或汗水滴进；倒缸、晾晒有一定的季节和次数。“济盛斋酱园”的酱菜之所以有：鲜明、清脆、咸甜、五香等特点，其原因：一、它是由“狼溪河”的河水腌制的，

河水清甜可口。二、它的主要原料是用狼溪河涯的土地种出的疙瘩，这种疙瘩有清脆、无丝等优点。三、在制作上，掌握了腌制的火候。一切工序清洁卫生，做到了不生醭，不生蛆。

军阀混战，灾祸连天，殃及百姓，“济盛斋酱园”一度萧条。于1938年6月，日本鬼子侵占东阿城后，酱园里的房子被扒，酱缸被砸，酱园被迫停业。亡国奴的日子是极艰难的。

解放后，东阿镇划归平阴县。这座东阿古县城里的人民不会忘记：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鬼子，使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在党的领导下，东阿镇的酱菜行业有了很大发展，使东阿酱菜这一传统名吃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解放后成立了酱菜研究协会。建立了酱菜厂、“五星酱园”、“鲍家酱园”、“张家酱园”等，结束了过去“济盛斋酱园”一枝独秀的局面。现在简直是“百花齐放”了。

东阿现代杂技名人传略

夏玉水 整理

东阿，杂技名人辈出，历代不乏名家。杂技艺术名人有二十人之多，其佼佼者有张正振、孟继钱、孟广富、张玉兰（女）、张兴功和杜春彬，较他们略早的还有一位张鹏芳。东阿近代杂技最早传人李半仙、张义成。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杂技艺术风格各异，但居处接近，时代相同，接触较多，有些人还是朋友，师徒相称，艺术上有相互影响的一面。以后由于社会造成的种种原因，也就风消云散，各奔西东，所以终于没有形成东阿特色的艺术流派。虽然如此，他们中一些人的艺术实践还是足资后人学习借鉴的。选择其中四人，将他们生平事迹介绍出来，以见一斑。

一、李半仙

李半仙（1870—？）在平县城南李庄人，是

清末民初齐鲁戏法高手。他擅长徒手戏法。“手彩”功夫极深，手法明快，交待清晰，表演戏法滴水不漏，千变万化，神出鬼没，使人百思莫解。他为人幽默风趣，所以人称李半仙，久而久之，本名则被人忘记了。

他毕生浪迹江湖，致力于戏法艺术表演，后期成立杂技马戏班社，一生教徒众多，而其中得意门徒多出于东阿。二十世纪初期，东阿著名杂技艺人张鹏芳、李金芝都是他的高徒。著名杂技艺人张正振，孟继钱，孟继功、孟继恩、陈明兴。是李半仙的第三代传人。

解放后，在党的重视关怀下，杂技艺术得到更迅猛的发展，杂技马戏团普遍建立。当时各团主要负责人有孟广富、王振沂、孟广连、刘庆一、陈正祥、藏庚汝，郑纪法、孟继富、孟继庭、齐金昌，苗正祥等，而上述团长，大都是李半仙的第四代传人。

李半仙膝下有三女一子，均得父亲真传，个

个是戏法高手，江湖艺人的佼佼者。他的养女李风英，七岁跟父学艺，深得杂技功夫中酥、小、软、绵、巧五项要领的真传，无不技艺精湛，红极一时，因此得艺名“盖山东”。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过她的表演。现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

李半仙一生从事戏法艺术，是近代鲁西杂技艺术一代大师，对东阿杂技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张正振：

张正振（1894—1978），二十世纪初期至五十年代，东阿县著名杂技艺人之一。

他出生于东阿县张大人集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童年给香山一个地主家做小工，受尽欺凌，因忍受不了地主的打骂，逃奔到东阿县贺庄，被著名艺人张鹏芳收留为徒，古谚讲：“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学艺刻苦，锲而不舍，“顶功”特别好，蹬、抹、撕、摘、下、支、横、拿、

蹶、扇十个基本动作扎实，并得要领，学艺四年，练出一身绝技。他还善演戏法，他表演“罗圈献彩”节目，“出托”、“回托”明快娴熟，不露破绽。

出徒后，他一直单走江湖，以“撂明地”度日。1919年他于东北吉林省一带创点：东盛杂技班，班社十人，以刀门地圈，武术气功，吞剑吐火，柱子软技，手彩戏法，为主要表演节目，徒步走会赶集，巡回于东北三省。两年后，节目增加了训猴、训熊和马术，并由“撂地”表演，发展成用布帷圈棚形式演出。

1921年他聘日本人竹野俊郎做翻译，经现在安东市去朝鲜国演出，这样东盛杂技马戏班不但是我县、而且是聊城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出国演出的戏班，张正振是第一个出国演出的人，赴朝鲜两次演出，遍走朝鲜各地，共六年之久，受到朝鲜人民的热情欢迎。

1926年，张正振率团回国，是当时东阿县规

模最大的团体，这期间主要演出于东北三省，山西、内蒙、青海一带。

1958年，往东台县，两县团体合为“跃进马戏团”，张正振因年事已高，退职回家，1978年逝世，享年85岁。

张正振近60年杂技马戏生涯，对东阿后期杂技马戏的兴盛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对东阿县杂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孟继钱：

孟继钱（1885—1954），是清末民初鲁西一带较有影响的杂技艺人之一。

他生于东阿县孟庄，自幼随父习武，剑器流星样样神通。他尤精七节鞭术，鞭法娴熟，可称一绝技。孟继钱十几岁投入张鹏芳门下，学手彩戏法。因他有武功基础，学艺进步很快，出师后，走京闯卫，开始浪迹江湖，以“撂地”谋生。

1946年，他创建“三盛马戏团”，和当时的

“东盛马戏团”、“全乐马戏团”齐名，成为东阿县四十年代后期规模最大的三大团体之一。

孟继钱创建的“三盛马戏团”主要在鲁西一带演出。为加强自己的阵容，着力培养儿子孟广连成为杂技名流。

孟继钱膝下二儿一女，大儿孟广连，次儿孟广成，女儿孟秀兰都从事杂技艺术工作，他的第三代人也大都是杂技演员，分别在山东省杂技团，聊城地区杂技团，河南杂技团工作。

1954年，孟继钱因病逝世，享年69岁。是东阿县杂技事业的前辈和奠基人之一。

四、孟广连：

孟广连，汉族，艺名“草上飞”东阿县孟庄人，四十年代末鲁西著名的杂技艺人。

他1933年生于东阿县孟庄，自幼在孟庄由奶母养大。10岁由父亲孟继钱领回，随父学艺，他聪明好学，并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特长，他把戏剧的亮相、走场、手势和眼神巧妙有机的和马戏节

目结合起来，使他表演的马术节目得到升华，如《八步赶驹》等节目，均收到较好的效果。他表演马术，每次亮相出场后，先策马奔跑，然后纵身一跃，飞身上马，猛夹马腹，催马狂奔，人翻转在马肚上下，他随马“蹶梭”动作，敏捷迅速，轻巧如燕，最后金鸡独立在马上，筋斗翻下，为此一举成名，人称“草上飞”。至今鲁西一带临清、高唐、冠县还流传着“草上飞”的传奇佳话。

孟广连不但善演马术，还会表演车技、走钢丝，滑稽丑角，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山东著名杂技演员之一。

1954年孟继钱去世后，“三盛马戏团”由孟广连任团长，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演出。

1959年，山东省第一届杂技马戏会演在聊城举行，孟广连表演的马术，受到与会领导的一致好评。

1962年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来山东拍摄电影《齐鲁英豪》，孟广连应邀参加了马术表演。

1981年，孟广连随团应邀进京表演，他年近半百，仍精神抖擞，他表演的《关公马上劈刀》气势磅礴，形象逼真，再现出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雄姿。中央电视台曾进行实况转播。《北京晚报》和其它报刊都相继以《齐鲁英豪艺超群》、《“草上飞”和他的马》为题，对他的表演给予较高的评价。

孟广连现是聊城地区杂技团马术教师，山东省杂技艺术家协会会员。

刘冠英传略

刘永禹

刘冠英，又名刘占甲，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四日，出生在东阿姜楼乡柳林屯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之家。父亲刘化鹏，勤奋老实，务农一生。全家六口人，男耕女织，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民国七年（1918年），国民政府腐败，土匪遍地而起，其父遭绑架，卖掉十亩地赎回，从此家业凋零，

一蹶不振。

十一岁时，在本村从教于杨保常老师，私塾学习五年，考入东阿县西城高级小学。看到国家的落后，立志走教育救国之路，叫乡村农家儿童都能上学，以摆脱愚昧落后状态。于是高小毕业后，没有升中学，而入了县立师范讲习所。从一九二二年毕业后，即踏上了教育之路，当上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一生忠于教育事业，对我县教育，做出了应有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工作者。

他曾在我县梁庄、凌山、皋上等地当过小学教师。一九三五年，是我县党的发源地——姜楼高级小学的校长，苏民、秦延彬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他是我县较早的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时，即在东阿西城高小搞学生运动，积极响应北京、济南等地学生号召，在校内同学中，组织了十人“爱国学生团”，宣传革命，抵制日货，号

召青年站到爱国救国的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此，曾遭到学校当局惩戒，并以开除要挟。但他不屈不挠，坚决带领全校同学，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他曾任我县教育会会长，为维护教师的尊严和权利，向当局进行过斗争。还号召教师，要利用讲台，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他时常在讲授地理课时，向学生讲述祖国河山的可爱，反动政府卖国求荣的可耻，列强侵略中国的暴行。号召学生，要立志保家卫国，时时刻刻，准备为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昌盛，献出自己的一切。讲到恳切处，慷慨激昂，有力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心，民族感。使不少学生，都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现在有的为国捐躯，有的成为我党高级干部。启蒙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巨大启迪作用的，是一生事业的奠基石。

他具有知识分子的耿直性格，主持正义，不

畏强暴。在教师训练班上，曾率领教师和国民党县党部常委段继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支持教师将其痛打一顿，为教师和学生伸张了正义。

“七七”事变后，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以教师的合法身份，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资格，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团结了不少各界名流，跟着共产党走抗日救国道路。

为了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上级党派徐翼来聊、阳、阿组建武装，党派刘冠英当徐翼同志的联络员，积极动员青壮年及学生参军参战。徐翼同志在不长的时间里，建起了抗日武装聊阳阿四大队。于一九四〇年四月，该队扩建为鲁西支队。于会川任司令员，徐翼任副司令员，彭天琦任政治委员，王唯一任参谋长，白晶吾任参谋主任，夏页文任政治处主任。这支武装，随鲁西行署和鲁西区党委行动。有力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革命，为东阿县抗日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发展，起

到了开拓和保卫作用。

一九四〇年元旦，东阿县抗日人民政府成立后，刘冠英任抗日中心小学校长兼宣化乡农会会长，并当选抗日边区人民代表。曾光荣的出席了冀鲁豫边区行署在观城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行署领导干部。

刘冠英领导的柳林屯村抗日中心小学，因积极抗日，支持共产党革命，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九四一年九月初三，大批日伪军包围了村子，将刘冠英逮捕，押到广粮门据点，严刑拷打，要他说出共产党的联络点和县委组织、驻地等，他都一一拒绝，闭口不谈。敌人误以为他已是党员，其实他还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仅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爱国心，用否认和沉默保卫了党的机密。广粮门据点日伪头子，向城里日本上司做了汇报，又将他押送日本宪兵队。宪兵队是杀人魔窟，里边有各种刑讯设备，刘冠英解到后，日本人鱼竹，亲自审问，

姓金的当翻译，企图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将我抗日力量歼灭。他闭紧牙关，不予理睬。日本人用洋狗咬，火烧、过电、灌辣椒水等酷刑，始终无效，他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始终没说一句话。党的组织，抗日政府的秘密，一点没泄露给敌人，保持了民族气节。以一个党外人士，在严刑和利诱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城里日本宪兵队关押两个月，带着遍体鳞伤，又被押解到济宁，转到济南日本军法处，照样用尽了各种刑具，三次过堂，五方会审，也没得到任何口供。后来又转到济南监狱，在那里见到了在押的东阿中共党员、县交通站站长焦书亭，他们带着一付手铐过堂，彼此装成陌路人，使敌人阴谋又一次没能得逞。敌人看看没有办法撬开他的嘴，于是又想用更毒辣的办法折磨他。一天夜间，悄悄将他解往日本人设的一个训练班，进行日语训练。两个星期后，将他们这批坚贞不屈的中国人，用闷罐车象猪罗一样运走了。及至大连后，

方知被送到抚顺千金寨煤矿罚苦力，他被分到赖大山矿坑十五口扒煤。

煤矿是日本人掌握，四面布满了电网。天天用刺刀、皮鞭，驱使着矿工为其卖命。没有安全设施，更不管饱。被掳去的同胞天天过着非人的日子。他被折磨得皮包骨。幸亏他那矿坑的把头是山东人，叫赵洪奎，看到他是读书人，年龄又大，再挖下去，性命难保，非常同情他，怜悯他，以老乡的情义，三个月后，以招募华工的名义，资助他离开千金寨煤矿。

他脱离险境后，闯过了日本道道岗卡，忍受着饥饿和疲劳，宿风餐露，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的又回到了根据地。当时聊城地委书记谢鑫鹤得知刘冠英的遭遇和在敌人狱中的表现，十分赞赏，认为他的行为，是党的忠实朋友，是一个有骨气的好知识分子。亲自批准给予分配工作，他写信给中共东阿县委书记秦延彬同志，介绍了刘冠英经得起严峻考验的种种表现，称赞他是民主

人士的楷模。经县委研究后，决定他到东阿抗日民主政府中，任教育科长，负责全县的抗日教育工作。一九四五年，由县司法科长胡雪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由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经过长期的探索、锻炼，终于找到了光明的出路。由党的同路人，成长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党员。

一九四六年，受党派遣，到黄委会工作。次年刘、邓大军渡河南下时，在郭口指挥部支持大军过河南下。以后，又相继出色地完成了黄河复堤任务。一九四八年六月，又奉命回到县政府教育科任科长。他任劳任怨，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服从分配，不打折扣，埋头苦干，不计名利，表现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高贵品质。

他复任教育科长后，正处建国前夕。我们这里是老解放区，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教育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才奇缺。他立即召开各种会议，贯彻党中央号召，

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体罚、训斥学生。开办各种师训班、干训班，加速培养干部和师资。为了改变农村愚昧落后状态，满足人民群众学文化的需要，还办起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识字班、扫盲夜校等，如雨后春笋，使沉睡的村庄苏醒了，各行各业生机勃勃，奋发向上。他知道，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建设新的国家，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刘冠英在东阿任教育科长期间，教育质量是比较好的。他作风民主，生活朴素，平易近人，深入基层，是教师和群众的贴心人。他为东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

建国后，奉调去茌平、范县任教育科长和文化局长，退休后仍关心教育事业，不断到学校去看望老师，和学生攀谈，文革中努力保护老同志，仗义执言，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民教师“照亮别人，燃烧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一九六七年，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与世

长辞。

刘冠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未入党前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表现了铮铮硬骨，民族气节，是党的忠实朋友。入党后，更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分配，能上能下，不计名利，哪里艰苦，哪里困难，就到哪里去。生活朴素，作风民主，工作认真，勤恳踏实。在教育战线勤奋一生。他热爱教育事业，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注：本文是根据走访群众和查询范县、东阿有关档案资料，综合而成，符合实际。

忆李健民同志

王建华

我与李健民同志，在东阿县公安局共同生活战斗了六年。为革命需要，各奔东西，相别数十年了。离开了东阿，南征北战，很少有机会见面。当我们退居二线，工作稍微轻闲时，约定共同回东阿，看望一下这块革命故土和曾与我们共同浴血奋战过的战友和人民。谁知夙愿未偿，噩耗传来，健民同志竟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悲痛之余，感慨万端。他生前的许多往事，一幕幕涌向我们的眼前。

健民同志是在一九四〇年受鲁西区党委派遣，来东阿开辟工作，任公安局长的。那时，东阿县抗日人民政府，刚在葫芦头成立，敌强我弱，环境艰险。负责党政机关及抗日人民安全的公安局，人员极少。我当时任侦察干事，直接受健民局

长领导，直到他调任博平县长。在他任职东阿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我们在健民同志带领下，反奸反特，除暴安良，由于党的领导和东阿人民的支持，取得了无数个胜利，直至日本投降。健民同志爱憎分明，机智勇敢，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处处热爱人民，依靠人民。他以身作则，克己奉公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健民同志一九一四年出生在茌平县博平镇一个农民之家，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京。自从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并同年入党后，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一生。

健民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当日本帝国主义大批入侵，疯狂屠杀中国人民时，他毅然参加抗日，在故乡组织了抗日青年救国团，并担任组织

部长。为了拯救祖国，抵抗外侮，他后来又参加了鲁西抗日三十二支队二团一营，任政治教导员；鲁西筑先纵队第七团任政治处主任。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成为国共联合抗日部队中的一名出色的军事人员。在抗日战争的炉火中，他逐步提高了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深知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挽救祖国与民族于危难之中，必须跟共产党走，并且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将军殉国后，他奉调去鲁西区党委社会部工作，随后来东阿任公安局长。当时敌人正到处修炮楼，挖封锁沟，残酷的对我抗日军民进行镇压。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公安局长的担子是沉重的。他知道重任在肩，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共产党人的胆略，勇挑重担，带领我们深入虎穴，除掉了汉奸队长张仙洲；镇压了敌特首恶孟广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局面逐步好转。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内部去做敌伪工作，瓦解敌人，发动群众，争取了无数日

伪人员，扩大了统一战线，使东阿形成了有敌人无敌区。敌人扫荡前，内线送出情报；扫荡中，抗日人员到敌人据点去躲藏。敌人据点成了抗日干部最安全的庇护所。一九四二年，日伪对山东根据地，进行了拉网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他带领我们和敌人周旋，与大部队配合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九四五年五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调任博平县长。后来又历任聊阳县委书记；冀鲁豫南下第六大队支部书记；江西鹰潭地委行署社会部副部长和公安局长。他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后，密切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党建政，发展生产，打败了形形色色敌人的进攻与破坏，开展了土改斗争，巩固和发展了新解放区。

全国解放后，他长时间从事治安保卫工作，参加过多次剿匪战斗。在他担任贵州镇远地区公安局长时，曾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从重从快，

宽严结合，重点突破等多项措施，消灭了敌人的猖狂进攻，确保了管辖区内治安秩序。一九五五年受国家委派，赴越南援建十个大型碾米厂，担任了援建工程专家组组长。他干一行爱一行，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紧紧团结广大技术干部和工人，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战胜了气候、环境带来的疾病折磨，圆满地完成了祖国交给的援外任务。回国后，健民同志转到了工业战线，先后任中央第二轻工业部直工部部长，机关党委副书记，轻工业部办公厅总支书记，中国工业美术协会负责人，中国轻工协会秘书长等职。他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朴实，知人善任。使轻工业在支援农业、重工业和出口创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重视科技进步，曾多次组织全国性的轻工学术活动，开展技术咨询，推广科普教育，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有力的促进了我国轻工业的发展。

健民同志在“文革”期间，对林彪和“四人

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粉碎“四人帮”后，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欢呼。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时期，他坚决拥护党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保障了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时时刻刻不忘党的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他深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带病坚持写出了多篇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他以亲历、亲见、亲闻，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健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无限的忠诚，他英勇的献身精神；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襟怀坦荡，刚直不阿的高尚情操；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每当回忆起他时，他生前的许多往事，便会呈现在我面前，激励我前进，牵动我哀思。

健民同志虽然匆匆的走了，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时时刻刻以他为榜样，革命到底。夕阳无限好，为云尚满天。我要保好革命晚节，继续做出应有奉献，以实际行动来寄托我们的哀思，做为对老战友的纪念。

注：本文系张醒民口述，王建华整理。

我国八个民主党派

(文史科)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八个民主党派，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团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策。现将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简介如下：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在反对帝

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长期斗争中，逐步联合，于1948年1月在香港正式成立的。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蒋光鼐、朱蕴山等为中常委。并于1948年元旦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5月，民革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9月，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于1949年11月，举行了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进一步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共同纲领》和《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互相监督，继

续亲密合作，一道前进。

民革的主要成员是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其中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科技、文教、卫生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现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2.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之一，是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民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党同盟。它成立于1941年3月，在重庆。由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协会联合组成。它的政治纲领主要是贯彻抗日、实践民主、结束党派、实施宪政。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以新时期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作为民盟的总任务，参与了对国家事务

的管理和对国家经济建设、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民盟中央领导成员张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胡愈之先后任人大付委员长；沈钧儒、张澜、高崇民、史良、庄希泉、童第周、胡愈之、费孝通、华罗庚先后任政协付主席；罗隆基、史良任森林工业部、司法部部长。民盟历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胡愈之、楚图南等，现为第五届。

3.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之一，是以从事工商企业和其他经济工作的人士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民建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胡子昂等人。成员是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和所联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和选举

中央人民政府。民建成立后，积极参加了爱国反帝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建国后，确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共产党亲密合作，互相监督。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进入历史新时期，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并以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作为民建的总任务，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在促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经营管理、经济咨询服务、智力支边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其领导成员黄炎培、胡厥文、荣毅仁先后任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李烛尘、胡子昂、荣毅仁、沙千里、王光英、刘靖基等先后任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沙千里曾先后任副总理、粮食部长，轻工部长等职。其主任委员为黄炎培、胡厥文、胡子昂等。现为第三届。

4.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之一。是以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民进1945年12月成立于上海，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主要发起人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郑振铎、严景耀、雷洁琼、柯灵等。成员大多是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1940年初，民进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建议书》，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呼吁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5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开展保障人权，反对内战，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等斗争。6月23日民进领导人参加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和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代表团到达南京

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毒打，马叙伦、雷洁琼等身受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林汉达不久也遭反动派密令通辑。1948年5月，民进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进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民进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民进以政协《纲领》和《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和中国共产党实行互相监督，继续亲密合作，一道前进。新的历史时期，重点转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并把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作为民进的总任务，在教育、

出版、咨询、支边等工作中，发挥了特长，做出了贡献。

建国以来，民进积极参与了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对国家经济建设、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民进中央领导成员马叙伦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要职；周建人任人大副主任；马叙伦、周建人、赵朴初、叶圣陶、雷洁琼先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民进现在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建有地方组织。历届中央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现在是第八届。

5.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

该党成立于1930年8月，1947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正式定名为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主席。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

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设独立富强的中国。1949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发挥该党优势，为四化建设服务，参与了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协商。其领导人在人大、政协、政府中，任重要职务。

目前，农工民主党在全国各省市均建立了地方组织。历任领导人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卢嘉锡。

6.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政党之一。

致公党于1925年10月，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原为洪门团体。1948年5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

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9月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建国后，致公党积极参加了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对国家经济建设、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不少人担任了人大、政协和政府职务。其领导人先后有陈其尤、黄鼎臣等。在14个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

7.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之一，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1944年底，一批爱国忧时的学术界人士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在重庆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把这个座谈会定名为“九三座谈会”。1946年5月，正式成立九三学社，积极参与了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运动。

1949年1月，积极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下，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科学咨询服务活动，办学和支边。不少成员参加了国际学术交流，积极开展同港澳、海外科学工作者的友好往来。其领导成员在人大、政协、政府中任重要职务的有许德珩、严济慈、周培源、茅以升、梁希等。学社历届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目前，在28个省市建有地方组织。

8.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之一。是台湾同胞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台盟是在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籍人士发起，于同年11月在香港成立的。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制度。台盟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于1949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政府。

建国后，台盟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和建设，为祖国统一大业和落实、接待台胞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在台胞较多的11个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

台盟总部理事会历届主席为谢雪红、蔡啸、苏子衡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东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作者 =

页数 = 202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